

关于清除党内 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一)

(党内文件·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办公厅編

出版說明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的整風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在我們党内揭露出一批資产階級右派分子，有的並且在党内窃据了重要的职务。把他們揭露出来並清除出党去，这对我們党的巩固和純潔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具有重大意义。

現在我們蒐集了有关党的組織对曾經担任过党的省委委員或相当于省委委員以上职务的三十九个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这些决定都已經中央批准），編成这本小册子，供地方县級以上的黨員幹部閱讀。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目 录

-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
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
录党籍的决议..... (1)
-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
同意清除右派分子孙作宾等出党的决议..... (6)
- 中国共产党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关于开除党内右派分子陈再励、王梦周、
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党籍的决议..... (13)
-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
开除孙殿才、梁大均等九人党籍的决议..... (18)
-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开
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劲椿、李锐党籍的决议..... (26)
-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开
除右派分子魏心一党籍的决议..... (32)
-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 (34)
-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第五次全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
刘洪涛党籍的决议..... (44)
- 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第五次全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
杜存训党籍的决议..... (48)
-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全体会议关于开除康健出党的
决议..... (52)
-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开除
右派分子梁旺贵党籍的决议..... (59)
-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

开除叛党分子刘健的党籍的决定.....	(64)
中国共产党监察部党组关于右派分子王翰的处理决定.....	(67)
中国共产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党组关于右派分子謝雪紅的政治結論.....	(72)
中国共产党农垦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刘培植党籍的決議.....	(83)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本部委员会关于陈沂问题的决定.....	(85)
中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编辑部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用文党籍的决定.....	(103)
中国共产党青島市第一屆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关于开除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克前、王偉、顧膺党籍及建議省委开除孙汗卿党籍的決議.....	(105)

中共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沙文漢、楊思一、

彭瑞林、孫章錄黨籍的決議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通過)

中共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全省四級幹部會議和省委第七次全體會議，遵照黨中央的整風方針，採用大鳴大放、大爭的方法，徹底地揭發和批判了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長沙文漢，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長楊思一，省委常委、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彭瑞林，省委委員、省委財貿部部長孫章錄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惡活動。代表大會一致認為：這是浙江黨組織內一場兩條道路的原則鬥爭。這場鬥爭的勝利，對於鞏固和純潔黨的組織，加強全省各級黨組織在中央統一領導之下的堅強團結，增強黨的戰鬥力，具有極為重大的歷史意義。

會議揭發的材料說明：沙文漢和楊思一兩人已經完全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在今年春天大鳴大放期間，沙、楊兩人和黨內外的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親如兄弟。沙文漢積極支持右派分子宋雲彬、李士豪、陳修良等對黨的猖狂進攻。楊思一同李士豪的關係極為密切，多方掩飾李士豪的反動面貌。在反右派鬥爭中，沙文漢、楊思一兩人又狂妄地抗拒中央的方針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計地包庇宋雲彬和李士豪，破壞反右派鬥爭，並且在事後還多方掩飾，拒不交代。會上揭發的材料說明：沙文漢、楊思一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貫的。在一九五六年浙江省第二屆黨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期間，他們就結合在一起，惡毒地向黨進攻。沙文漢在那次大會上

宣揚資產階級的政權觀點，誣蔑我國的人民民主制度，反對黨對政權工作的領導，並且支持以黃源為首的文艺界反黨集團的資產階級文艺路線。楊思一除了積極支持沙文漢的反動的政權觀點以外，還捏造事實，惡毒地否定全省幾年來的工作成績，歪曲黨內生活真相，自吹一貫正確，冒充群眾代表，攻擊黨的領導。在肅反運動中，沙、楊兩人對黨的肅反政策也心懷不滿，楊思一並誣蔑肅反五人小組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代表們還一致指出：楊思一幾年來一貫堅持地方主義宗派主義立場，在黨內拉攏一部分人，打擊一部分人，甚至發展到在省委常委內部劃圈圈，處心積慮地製造黨的分裂。沙文漢在工作上長期不負責任，而且生活腐化、道德敗壞，完全喪失了革命意志。此外，沙、楊兩人幾年來還安插了許多反革命分子、叛徒和政治面貌不清的分子，到國家機關和企業事業機關工作。

會議揭發的材料說明：彭瑞林在最近整風期間，在省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利用大鳴大放的機會，惡毒地向黨進攻，誹謗省委是右傾機會主義，誣蔑省委常委会“有負中央負責同志、有負黨代表大會和省委會的委託”，完全否定了省委領導的正確性和全省的工作成績。會議揭發的材料說明：彭瑞林的反黨活動也是一貫的、嚴重的。二十年來，他不斷向黨鬧個人地位和待遇，長期對黨不滿。特別是最近幾年來，他更從嚴重的自由主義發展到在黨內造謠生事，挑撥離間，搬弄是非，支持沙文漢和楊思一，拉攏一些人進行反黨宗派活動。去年全省黨代表大會期間，他和孫章錄等結合在一起大鬧主席團，破壞主席團對於大會的正常領導。他平時常以“炮手”自命，實際上是一貫猖狂地反黨。

會議揭發的材料還說明：孫章錄幾年來在黨內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宗派活動。他經常搬弄是非，煽動對黨不滿情緒，企圖製造混亂。去年全省黨代表大會期間，他是反黨宗派活動的主謀者。他為了達到個人的卑鄙目的，背着主席團召開會議，組織破壞性的發言，造成會議的混亂，並且和彭瑞林等結合起來，反對

党的领导，一度使会议形成两个中心，使领导有陷于分裂的危险。他还在省委书记处的人选问题上进行非组织活动。在中央负责同志对他作了严肃的教育批评以后，仍然采取抗拒态度，继续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在其他同志中进行煽动，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是“压服”，诬蔑省委谎报情况，“借外力来解决内部问题”。

代表大会着重地指出：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等长期坚持错误，拒绝党的教育和批评。在去年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央负责同志对他们四人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和批评，省委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等待他们的觉悟。但是，他们一直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继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直到今年整风期间和这次会议上，他们的态度仍然极其恶劣，在到会代表一致谴责之下，他们才被迫承认一些罪行，但是並無悔改诚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代表大会一致指出：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和孙章录所进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活动，对于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应当看到，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全省人民和全省各级党组织的努力，浙江几年来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全省各级党组织基本上也是团结的。但是，由于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一直进行着公开的和秘密的反党活动，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的团结，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给全省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因此，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党。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更坚强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依靠广大群众，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所以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不是偶然的。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正在被消灭，资产阶级分子正在被改造，资本主义所有

制基本上被消灭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熄灭，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和资产阶级世界观还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将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种斗争不能不在党内反映出来。特别是在政治上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党内的这种斗争也必然会激化起来。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疯狂地进行反党活动，并且直接间接地和社会上的右派同流合污，一唱一和，最后和党分裂，正是这个矛盾和斗争的具体表现。应当特别指出：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都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长期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思想，一有条件，就力图使用他们的影响，企图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党。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影响下，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就必然发展成为修正主义者，在组织上必然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活动，这是他们终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的根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都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们都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念念不忘个人的名利、地位。在他们看来，个人利益比什么都重要，至于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对于他们都是空话。因此，当他们无限制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必然要对党不满，并且一步一步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步。这是他们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思想根源。

代表大会认为：指出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是为了提醒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认真地吸取教训，努力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加强党性锻炼，为保持党的纯洁和团结统一而作经常不懈的努力。

代表大会经过讨论以后，一致决议：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和孙章录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撤销他们党内的一切职

务，开除党籍，在党内外公布，並且向有关方面建議撤銷他們的一切行政职务。

代表大会認為，为了巩固全省党組織在党中央領導下的团結和統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全省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必須按照党章和党中央历次指示，切實遵守下列各項原則：

第一、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觀，一定要有大公無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畏困难和百折不撓地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反对鬧名譽、鬧地位、鬧待遇，反对斤斤計較个人得失，反对驕傲自滿、自以为是、独断專行。

第二、維護党的团結和統一，維護党的領導，反对自由主义、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坚决地执行党中央和上級党組織的決議和指示；反对擅自修改党的政策、改变党的任务的無組織、無紀律的分散主义傾向。

第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發揚党内民主，經常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虛心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評和监督；反对只能受表揚，不能受批評的錯誤态度；禁止对批評者进行打击报复。

全省各級党組織应当將本決議向全体黨員深入地傳達，結合实际情况，認真組織討論，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錯誤傾向。还应当加强党的統一集中領導的同时，繼續發揚党内民主，放手發動群众，开展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真正實現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潑的那樣一种政治局面，以便团結全省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二届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同意 清除右派分子孙作宾等出党的决议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扩大），彻底揭发和粉碎了党内右派分子孙作宾、潘光亚、刘杰、高继先等的罪恶活动，将他们清除出党，并报经中央批准。这是反右派斗争在党内的重大胜利，对于青海地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认为：省委第二届第五次扩大会议，对于党内右派分子孙作宾等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二

右派分子孙作宾，是窃据在省委领导核心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是资产阶级、牧主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省委同他的根本分歧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原则同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斗争，是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反党的路线、方针的斗争，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斗争。孙作宾在青海的主要谬论和罪恶活动是：反对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说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不走合作化”，也“不要搞公私合营牧场”，所谓“办法”是依靠牧主阶级“自动放棄剝削”，鼓吹“果洛地区两年内大体可以放棄旧制度”。他的资产阶级路线是自上而下，依靠头人，

說“抓过来上層，就会抓过来群众”。夸大民族矛盾，根本否認牧業区有階級存在，反对階級斗争。說牧業区“上層、宗教、群众是三位一体”。說上層人物和共产主义幹部是“父子关系”，压制劳动牧民反抗牧主剝削和压追的正义要求，窒息階級斗争力量。他把一切問題都归罪于“大汉族主义”，把汉族幹部丑化成“大汉族主义者”。反对無产階級專政，反对肃反。到处污蔑“肃反过火，冤枉了好人”，还指示根本没有进行肃反的果洛地区也要“平反”，又積極破坏反右派斗争，他把右派分子看成是我們臆造的。公开包庇右派分子，糾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並令右派分子潘光亞搜罗了五百五十一条“意見”，作为攻击省委的毒箭。反对平息武裝叛乱的方針。說川北、川西及本省河南县达参部落的叛乱是大汉族主义造成的，否定其反革命性質，說“不該打”。反对党的領導。要民族上層人士当“司令員”，我們当“參謀長”，还要全体幹部團結在上層人物周圍，“他們同意什么，就作什么”，否則就是“强加于人”。反对省党的第二屆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建設方針，反对工業建設，提倡多修寺院。由于他的資產階級政治观点，因而也在生活作風上腐化墮落，工作一貫不負責任，甚至电报、公文和報紙都要由秘書唸給他听。

上述鉄的事实，充分說明孙作宾是頑固地反对中央的路綫、反对省委的領導，兇惡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孙作宾的反党活动其所以危害性大，是由于他的党齡長，窃取了高級职位，並披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玩弄兩面派手法，勾結右派分子潘光亞、刘杰等，进行宗派活动，組成反党集团，企圖夺取省委的領導权，以达到其个人野心家的罪惡目的，夢想实现其修正主义綱領。孙作宾的反党活动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制造了“白区党”、“苏区党”的謬論，在甘肃工作时又提出所謂“甘人治甘”，搞小集团，鬧地方主义。孙作宾等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非無产階級的立場沒有根本改造，資產階級个人主义一直在發展，

着，当社会主义革命繼續深入的时刻，便公开背叛党，瘋狂地向党进攻，反对革命。省委为了坚持党的路綫、方針，曾对孙作宾等作了長期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斗争。但是，他們繼續坚持其反动立場，毫不悔悟。在全面檢查孙作宾的反动言行开始时，他竟私逃蘭州，逃避斗争。省委第二届第五次扩大會議，徹底清算了他們的罪行，並以这些反面教材教育全体黨員，从思想上消除他們所造成的影响和毒素，是絕對重要的工作。

三

右派分子孙作宾的政治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一系列根本問題上，完全違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原則，成为徹头徹尾的修正主义者，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無恥叛徒。他的修正主义，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个問題上：

1、社会主义是各族人民徹底解放的根本道路。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須解放生产力，从經濟基础上改变私有制。必須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发动和依靠各个民族的劳动人民，經過激烈地階級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为了保証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各个民族的局部要求，必須服从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共同的革命斗争利益。而孙作宾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义关于無产階級革命的学說，違反社会發展規律，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瘋狂地阻撓和破坏畜牧業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义关于階級和階級斗争的学說，宣揚牧主階級可以“自动放棄剝削”，鼓吹剝削階級与被剝削階級“階級合作”。

目前，青海地区社会主义革命飞躍發展的事實，进一步批駁了孙作宾的修正主义。在牧業区翻天覆地的改造高潮中，广大劳动牧民是热烈拥护社会主义的，要求合作化如飢似渴。各州已建立一千多个牧業社，海西、海北、海南已先后基本实现了合作化。事實也証明，牧業区不仅有階級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階級斗争非常激烈。广大牧民群众，經過社会主义大辯論，痛哭流涕，訴出千年苦水，万年仇恨，从而正在把自己进一

步組織起來，徹底整頓和改造基層政權。牧主階級中的部分人，由於大勢所迫，人心歸向，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而少數死硬派則勾結反革命和帝國主義分子，掀起武裝叛亂，要同共產黨較量到底，作垂死掙扎。這完全暴露了反動階級的猙獰面目。階級鬥爭的烈火，是徹底燒燬了所謂“推動牧主自動放棄剝削”的胡說。

事實教育我們進一步認識：畜牧業的社會主義道路，是牧業區各族人民繁榮和發展的方向。絕不能借口民族特點，而放棄這個共同道路。因為，社會主義道路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對於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每個民族內部都分裂為剝削與被剝削兩個根本對立的階級，這是客觀存在的。階級的消滅，只有經過階級鬥爭的道路，才能達到。任何否認民族內部沒有階級存在和階級鬥爭，都是資產階級民族觀點，只能模糊階級鬥爭的觀念，必須徹底清除。革命不容許麻痺人民群众的階級鬥爭意志，不容許在精神上解除武裝。自然，階級鬥爭的形式會是多種多樣的，反革命武裝叛亂不過是反改造的階級鬥爭形式之一，也是階級鬥爭的最高表現，即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階級鬥爭還將持續一個時期。

2、黨的統一戰綫是階級鬥爭的武器和特殊形式，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統一戰綫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在過渡時期，統一戰綫工作的目的，是為了減少阻力，增加助力，多快好省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共產黨是統一戰綫的領導力量，社會主義是統一戰綫的政治基礎。而孫作賓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統一戰綫的理論，以及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的理論。只要上層，不要群眾，說“抓過來上層，就等於抓過來群眾”，夸大民族上層的作用，“號召”黨員團結在大牧主的周圍。

事實教育我們進一步認識：黨的統一戰綫政策是完整的階級路綫，既要團結又要鬥爭。團結是為了調動積極因素，以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从当前牧業区阶级斗争形势看，以往对上層分子斗争和改造不够。今天，其所以强调对他們的改造，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要从經濟上消灭牧主所有制，从政治上徹底摧毁封建統治和特权。統一战綫工作，还必须与群众工作相結合，統一战綫工作原为群众革命运动的順利进行，而群众的革命运动則是实现历史使命解放自己的根本力量。目前，在牧業区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改变了几千年封建所有制、創造了新的政治局面的，正是在共产党領導下的广大劳动牧民。

孙作宾等也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問題的理論，把宗教教义說成与我們党的政策是一致的，極力夸大宗教影响等。而馬克思主义者則認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宗教和共产主义是根本相对立的。正如恩格斯說的：“尽管聖經中若干地方似乎有利于共产主义，但聖經教义的一般精神……对共产主义是絕對敌視的”。特別是牧主阶级將被消灭的时刻，便比任何时候更無恥地要利用宗教来控制人民，用来瘋狂地反抗社会主义。因此，党对宗教和寺院的工作必須加强。在工作中，应把反动阶级利用宗教来作为阶级斗争工具和群众的一般信仰严格区别开来。凡是利用宗教作掩护来反抗社会主义的，必須剝开他們的反动面目，打碎“保护宗教利益”、“保护民族利益”的招牌，並应坚决鎮压。对于一般爱国守法的宗教职业者，要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使他們拥护社会主义，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不允許有任何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对于群众一般宗教信仰必須尊重，因为，宗教对人們的影响有着它的历史原因。我們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須積極向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教育和科学知識的教育，使他們正确地認識社会現象和自然現象，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要經常地进行共产主义和正确地对待宗教問題的教育，务使他們分清共产主义与伊斯蘭主义、釋迦牟尼主义，分清党的政策与宗教教义的根本界

限，必須徹底確立共產主義思想。

3、無產階級專政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條件，而專政的核心是共產黨的領導。黨是各族勞動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無產階級的戰鬥司令部。而孫作賓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的學說。宣揚牧主上層的作用，又反對平息牧主上層和反革命的武裝叛亂，不從反動階級本質上去尋找叛亂根源，却說是大漢族主義造成的，阻止向牧民群眾進行階級教育。

事實教育我們進一步認識：历次的反革命叛亂，都公開叫囂“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顛覆人民政權，也殺害本民族共產主義幹部、勞動人民中的積極分子及上層人士中的進步分子，企圖維護剝削階級的經濟利益，與封建統治制度。省委以往對於叛亂，採取了堅決平息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特別是在最近，一面用武力平息反革命叛亂，打擊最兇惡的敵人；一面大刀闊斧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樣，更有助於迅速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徹底摧毀牧主階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勢力。叛亂是壞事，但是壞事中有好事，經過努力是可以變成好事的。如最近的叛亂，既有利於肅清反革命分子，又促進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加速實現，並且徹底改造了基層政權，真正實現了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

四

自省委第二屆五次擴大會議，清算了孫作賓等反黨罪惡活動之後，青海地區黨的生活中，出現了意志更加一致而又生動活潑的氣象，各方面均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大躍進局面。為了從各个方面徹底消除孫作賓等反動的思想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我們必須：1、徹底地改造自己，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一切具有嚴重地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在政治上總是不堅定的，容易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也正是陰謀分子的市場。每個共產黨人，必須徹底克服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忠心耿耿地獻身於共產主義，在任何風險中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明辨風向，高舉革命紅旗。同時，要善於把堅持原則和創造精神結合起來，在堅持真理的原則下，敢想、敢說、敢做。迷信必須打破，所謂青海落後的論調必須批判，自卑心理必須克服。鼓足革命幹勁，堅定勝利信心。2、增強黨的團結，維護黨的統一。經過反右派鬥爭，清除了一批隱藏在黨內的階級敵人，純潔了黨的組織，鞏固了黨的團結。但是，由於黨員數量日益增多，出身不同，經歷不同，水平不齊，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我們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年年要講團結，月月要講團結，而且每天每時要講團結”。必須加強黨的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斷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統一認識、統一意志，勤勤懇懇地為黨為共產主義事業，做好工作。3、加強共產主義教育，首先是要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特別是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範，是指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總結，又是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綱領，是現實政策，又是高度理論，是活的唯物辯證法。現在黨內學習理論的空氣仍然不高，特別是對於毛澤東思想，重視鑽研不夠，不少同志對新鮮事物感覺遲鈍，缺乏預見性，就是由於學習太差。這種狀況，如果不下決心改變，要繼續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只有對毛澤東思想刻苦鑽研，確實領會其精神實質，才能真正跟好、學好、做好，把思想提高到共產主義水平。

註：孫作凱原任青海省委書記、省長，潘光昭原任青海省河南縣委第一書記，劉杰原任青海省妇联主任，高繼先原任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編者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

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 开除党内右派分子陈再励、王梦周、 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党籍的决议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法，开展了党内两条道路的斗争，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了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王梦周，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廖原，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骆明，省委委员、省委文教部长王浩，省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兵役局长廖联原等人在内的右派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活动。代表大会一致认为，这一斗争的胜利，对于在全区范围内进一步深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从而有力地贯彻执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动我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从大会以及大会之前所揭发出的材料说明，这一右派集团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已经延续了一年之久。从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共广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他们就打着“反冒进”“反主观”的旗号，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中央宣布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了最高峰。在党内检查因灾饿死人事件的会议上，他们直接违反了中央对这一事件的正确结论，横

生枝节，借題發揮，硬把因災餓死人事件說成是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所帶來的惡果，並進而全盤否定廣西的工作，認為黨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綫錯誤”，要求“重新估計农村工作”，要求省委“肯定錯誤”。

這一右派集團集中攻擊的首要目標，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和伴隨而來的農業生產高潮。他們根本否定我區廣大農民熱烈響應黨的號召，迅速實現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這一偉大的歷史行動，把農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說成是“強迫出來的”，“農業合作化太快了”。他們竭力攻擊合作社“只顧集體，不顧個人”，要求無限制地發展社員家庭副業，借以瓦解合作社的集體生產。他們否認合作化的優越性，把合作社的生產說成一團糟。對一切足以說明農業生產成績的材料數字，特別是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糧食增產的數字，一律認為是“吹牛”，“虛夸”，“是報喜不報憂”的表現。事實很明顯，他們不遺余力地攻擊農業合作化的目的，就是企圖扭轉歷史的車輪，使全區農民群眾從社會主義道路退回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

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省委是始終貫徹執行黨中央所規定的社會主義革命總路綫的，並且同他們的反社會主義言行進行了鬥爭。當他們看到，把自己的右派意志強加於黨的企圖沒有能夠實現時，就竭力地攻擊黨的領導。他們不惜採取極其卑鄙的兩面派的手法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由於黨委不接受他們的反動觀點，並且對他們的反動觀點進行批判鬥爭，他們就歪曲黨內生活的真相，大肆攻擊“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黨內沒有民主”，“書記一手遮天”。省委貫徹執行中央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被他們攻擊為“教條主義”，“好大喜功”，“不從實際出發”。他們為了削弱和擺脫黨的領導，就極力鼓吹分散主義，反對黨對政府工作的領導，抗拒黨對各部門工作的統一領導，說黨的領導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只聽塊

塊，不聽條條”。特別惡劣的是，他們還進行許多非組織的活動，到處散布流言蜚語，污蔑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丑化黨的領導，企圖使黨陷於分裂和癱瘓的狀態，使黨變成某種爭論不休的俱樂部。

這個右派集團，特別是廖聯原，還極力地鼓吹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他無中生有地污蔑省委存有“宗派主義”和“大漢族主義”，把解放初期，黨為了純潔革命隊伍而對地下黨和游擊隊所進行的整頓工作，誣蔑成為對地方幹部和民族幹部的“打擊、排斥和刁難”。根據所揭發材料，廖聯原在去年曾經借着下鄉視察的機會，捏造事實，敵我不分，替一些被清除出革命隊伍的投機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喊冤；並對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群眾進行欺騙煽動，企圖挑撥群眾對黨不滿。這個右派集團的首領陳再勵，也利用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情緒，來攻擊黨委不重視民族區域自治工作，抹殺黨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偉大成就，誣蔑桂西僮族自治州是“形式主義”，企圖挑撥民族關係，分裂廣西各族人民的團結。

這個黨內右派集團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事實上起了互相呼應的作用。他們也承認，他們的言論就是在詞句上也是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一模一樣。在社會上的右派分子向黨瘋狂進攻的時候，他們都在或明或暗地大加喝采。在去年五月省委召開宣傳會議時，作為會議直接領導人的駱明和王浩，竟然嚴重歪曲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否認兩條道路鬥爭的存在，混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界根，極力支持右派分子向黨進攻，並且把這些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稱做“寶貴的意見”。事實說明，他們早已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一道，唱着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同一調子了。

由於這個右派集團的分裂活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使省委的集體領導陷入了極度的困難，使黨的正確路線受到了極大的障礙，使廣大的基層幹部和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受到了沉重的

打击，並且一度造成了幹部思想上的混亂，助長了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削弱了黨的战斗力量，給全區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社會主義建設所出現的低潮，就正是這股妖風直接造成的惡果。

陳再勵、王夢周、廖原、駱明、王浩、廖聯原所以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決不是偶然的，我們黨正處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這種鬥爭不能不在黨內反映出來。這個右派集團的成員，雖然很早就組織上入了黨，但他們在思想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並沒有得到改造；加上他們都有著嚴重的個人主義，自然就會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緊要關頭，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走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

在這裡必須指出的是，當這些人犯了這樣不可饒恕的錯誤和進行了這樣的罪惡活動之後，黨仍然沒有放棄對他們耐心教育和進行挽救工作，希望他們能夠徹底醒悟，痛改前非。在去年六月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期間以及會議之後，黨曾和他們進行了多次的個別談話，促其悔悟，但被他們拒絕了。在十二月省四級幹部會議上，黨總結了過去一年來黨內外兩條道路鬥爭的經驗，對他們過去的罪惡言行，做了沒有指名的嚴厲批判，目的也在促使他們能夠主動進行檢查，但他們仍然無動于衷，反而對黨的批評抱有很大的抵觸情緒。黨是無可再忍了，于是在今年二月間的省委全會上，向他們展開了鬥爭。由上可見，這些人的反動立場，是極其頑固不化的。

代表大會經過討論以後，一致決議：開除陳再勵、王夢周、廖原、駱明、王浩、廖聯原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的一切職務；並且建議有關行政方面撤銷他們在行政工作方面所擔任的一切職務。在黨內外公布這個決議。

代表大会一致認為，清除以陈再勵有首的右派集团，是广西党内兩条道路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为了巩固全区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統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須認真接受以下的經驗教訓：

第一、必須在党内外繼續深入开展兩条道路的斗争，把整風运动进行到底，提高全体党员和干部的社会主义覺悟，坚定無产阶级的立場。在进行兩条道路斗争时，必須严格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兩条道路的斗争，必須严格遵照团结——批評——团结这一公式去进行；属于敌我之間的兩条道路的斗争，如对右派分子，則必須加以無情的揭發和孤立，並应把党内的右派分子清除出党。

第二，全体党员必須認真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提高政治理論水平和革命警惕性，学会識別風向，分清大是大非，敢于坚持真理，旗帜鮮明，为真理进行不屈不撓的战斗。

第三，必須坚持維護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加强党的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民主，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同时必須在發揚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巩固党的組織，坚决执行党的統一领导原則。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須在这次斗争所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提高思想，依靠群众，貫徹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把全区的社会主义建設迅速向前推进。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

第二次會議关于开除孙殿才、

梁大均等九人党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徹底地揭發和批判了省委常委、副省長孙殿才，前副省長陈成义（已死），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梁大均，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長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長王新潮，銀川專員曹又参，交通厅副厅長林里，商業厅副厅長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長馬济川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

會議揭發的大量材料証明：孙殿才、梁大均与陈成义、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曹又参等同流合污，結成了一个右派集团，以省人民委員會和銀川地区为据点，以地方主义为綱領，以实现个人野心为目的，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

孙殿才是这个集团的主帅，他对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惡毒攻击。陈成义說自己在政府工作是“傀儡”，孙殿才說他也有“同感”。他們共同攻击說省委“包办一切”，“管的真寬，連芝麻、綠豆都要管”。說党委是“以党代政”，政府是“有政無令”。陈成义落选后，他說这是“宗派打击”。关于增加两个副省長的人选，会上他們都同意，但会后却对省委一个常务委員（地方幹部）說：“某某人当副省長我們不同意，你應該当副省長”。在醞釀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划时，他主張將平涼專区划入自治区，当他的主張被党外人士質問得不能自圓其說时，便說“这

是省委決定。”事實上省委當時並未討論過這個問題，更無權決定這樣的重大問題。當省委批評了他的這個錯誤之後，他又在一些回族同志面前說：“我因為對成立自治區太積極，主張把自治區劃大，受到省委的打擊”。但當中央決定給自治區調外地回民幹部時，他又與梁大均密謀，企圖多擺當地漢民幹部，“頂住”外來回民幹部，使之不能到自治區工作。他反對羊群入社，為地主富農叫喊。他在視察銀川吳忠途中，到處指責下邊羊群入社搞得太快了，折價太低了，自留量太少了，分紅比例太低了。並命令縣區黨委給有些地主富農退回一些羊子。他主張“三百只以下自留百分之五，三百只以上自留百分之十，三、四十只以下不入社”。“不論大小，平均折價綿羊每只十二元，山羊每只八元”

（高於當時折價一倍多），當省委否決了他的意見，另提出一個指示草稿要他們在省人民委員會討論下達時，他和陳成義與黨外人士扭在一起，四次不予通過。黨外人士說這簡直是“二次土改”，他便說這是“一步登天”。他視察工作時只聽地主、富農和右派分子反映，代表那些人誣蔑農業合作化後“今不如昔”，“社員沒錢買油、鹽、洋火，幾家子點一盞燈”，“拉雙輪雙鐮犁，把婦女們的身體搞壞了”。“銀川種了六萬畝棉花，百分之九十沒有希望”。推廣“京祖一〇七（水稻良種）連種籽也收不回”，“復種的莊稼都沒結好”。他還對統購統銷、價格政策和稅收政策等有一系列的反社會主義主張。他的生活腐化、道德敗壞。這次他估計到自己問題嚴重，過不了關，便與梁大均密謀破壞黨代表大會，拍著口袋說：“我這裡有一口袋材料，我要過不了關，我便親自寫大字報，現在有許多人對省委不滿，不敢講。我要一連出他幾十張大字報，我的大字報一出，你再看這個熱鬧。”

梁大均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一九五六年秋季以後，特別是醞釀成立寧夏回族自治區期間，與孫殿才一起，進行陰謀活動，反對省委，分裂黨的團結。誣蔑省委是“讒臣當道”。挑

撥省委同志之間的关系，說省委委員某些人是紅人，某些人不在話下，某些人自願不暇，某些人是挨整的。說批判“甘肅落後論”是某某人反對某某人。醞釀自治區區劃時，他私自增加人選和首府兩個項目，要各縣討論，進行“民意測驗”，製造輿論，抬高自己。並聲稱自治區首府如不設在銀川，銀川將退出自治區。他保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罵糧食幹部是“不顧眉眼為國家積累”，諷刺國家稅收政策應該“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他同情私商誣蔑我們“比馬鴻逵刮得還厲害”。他對於單幹戶的所謂八大自由，不但不批判，反而認為省委提出批判是給“幹部潑冷水”。他號召群眾做生意、跑運輸，在他的“社開大片（荒地）、隊開中片、社員開小片”和“膠輪小車拴一輛，掙下錢來歸自己”的口號鼓舞下，資本主義一度在銀川自由泛濫，致使一九五七年全區三十二萬畝地未種或荒蕪了。梁大均也是生活腐化，道德敗壞。他也知道自己問題嚴重，難於過關，便向自治區工委負責同志要求，不參加黨代會，與孫殿才密謀“抖亂”黨代會，會前在銀川地委進行非法活動，並裝病十多天不到會。

陸為公是這個集團的成員之一。他在省人民委員會與孫殿才、陳成義一起以政抵黨，說“省委管的太多了”，認為省委領導政府是“干涉”，他在政府是“有職無權”。他反對合作化，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成績，他說，“說一團糟的有的有根據，有的隨聲附和”，“單純的任務觀點，加上不純的動機，就把事情辦壞了”，“把十二年任務想在一朝完成”，“牲口死了這樣多，原因何在”，“五百多萬畝水地，是六百條人命換的”（實際死了一百多人）。他認為，“官僚主義大部分在上邊，越上越多”，黨的領導“總是喜歡聽好的”。他反對文字改革說“改得不三不四，不象樣子，現在聖人太多了。”說“拉丁化以後，衆奸不分，教育廳長兼（奸）女中校長，就會鬧笑話。”他反對批判“甘肅落後論”、散布地方主義，說“甘肅本來就是一個落後的省份，在歷史上就是受外省人統治的”。

刘余生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他积极主张“甘人治甘”，排斥外来干部。自封他是“甘南民变的领袖”，是“甘肃第一个拿起枪杆的人”。说“外省人不了解本地情况，当领导人不合适”。诬蔑外来老干部说“古瓷古画还可以当古董，作摆设用，光憑老資格，有什么用处？地方干部生長不起来，就是被一些老資格压住了。”党給民政厅派干部时，他首先問“是不是甘肃人，干部要地方化，外省的不要”。陈成义落选，他認為是“人身攻击”，他說陈成义“总是从甘肃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远利益上想問題的”。他常常玩弄兩面手法，在干部中播弄是非，挑撥离間，对逢迎他的人，封官許願，提职增薪，对批評他的人，想尽办法，打击排斥。在反右派斗争中，說“反对我，就是反对党”。把給他貼大字报的同志，說成“反党联盟”，把支部彙报說成“秘密會議”，並追問誰是后台老板。他認為民政厅整風是“外来人整地方人”。他說“棉布供应有問題，很多人劳动一天，回来沒被子盖”，“粮食統購太死了，只留一些口粮，連种籽都不留”，又說“农民生活太苦了，工人生活好，工人、农民生活相差太远”。

王新潮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他与孙作宾共同撰写甘肃地方主义綱領——孙作宾一九五二年“关于甘肃民族統战問題的報告”。右派分子說“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中間有溝和牆，这是白眼窩的人（小丑）造成的”。他即說“这样的人不仅党外有而且党内也有”。右派分子說“共产党打牆，共产党在牆內，民主党派在牆外，积极分子騎在牆头上”，他贊揚說“講的很好”，在大鳴大放期間，他希望組織劳改釋放犯和反革命分子家屬參加鳴放，他把一些五方面敌人吸收为民盟盟員。在反右派时，他說民盟只出現了一些右派言論，沒有右派分子。他还在“甘肃盟訊”上發表文章提出“採取更积极更有效的办法，放手發展組織”，並批判“盟內有些同志要求过高过严，束手束脚”。他否定統战工作成績，攻击党的領導說，肃反后民主人士来統战部的少了，

过去对民主人士思想改造“过火了”，民主人士感到统战部是“冷冰冰的”，因而是“敬而远之”，“要求多统少战”。他对陈成义的落选，表示不满。对党处理严重违法乱纪的地方干部張友三，認為是打击、排斥。他在自治区区划問題上玩弄兩面手法。

曹又参也是这个集团的成員之一。他积极支持孙殿才反社会主义的綱領。由于积极支持孙、梁的右派活动，梁大均称赞为“好外交家”。他有意压低銀川專区粮食产量，抗拒負担和統購任务，說“一九五六年生产任务訂冒了，負担重了”。他說“我們的各項工作都冒了，合作社办的太大，超越了历史界綫。开荒、植棉和造林任务都是冒进的，技术改革搞坏了。这都是領導上腦子發热以風为准造成的”。他反对肃反运动，說“肃反运动搞糟了，斗争面太寬，搞的过火了”。党外右派分子反对党的文教政策和肃反工作，他贊揚說“你講的好，將文字加一下工，送到报社去刊登。知識分子已經改造好了，共产党还缺少一課——不懂業務”。

这次會議上，除揭露了孙、陈、梁右派反党集团以外，还揭露出右派分子林里，階級異己分子梁克忠和頹廢墮落、違法失職、反党反領導的投机分子馬济川。

梁克忠是一个以欺騙手法混入党內，地主階級本性未改的階級異己分子。他身为商業厅副厅長，却極力攻击党对私商的限制改造政策。反对民主評議稅款，反对飲食業定質定量定价，反对国营公司控制貨源供应，反对限制自由市場。他誣蔑“私改工作一場糊塗”，他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謬論，同情私商裝穷叫苦，亲自給私商發放救濟款，搭配热貨，多方照顧；並鼓动私商控告国营公司，因而私商称他为“梁青天”。他攻击社会主义商業，說国营公司职工加班加点“和資本主义剝削职工剩余劳动一样”。他一貫播弄是非，搞宗派活动。他把省委領導幹部划分为陝北派、晉綏派、庆陽派，並誣蔑省委排挤打击晉綏幹部。

誣蔑省委提拔某某是“朝里有人好坐官”，某人当省委書記是憑地方幹部，某人当副省長是憑民族幹部，提某人是因为“書記看得起”。又常在部長面前說厅長是宗派主义，在厅長面前說部長是主觀主义。

他在商業厅組織小宗派，打击別的副厅長和科長，把持总支、支部、人事科，破坏党的德才兼备的幹部政策和建党的階級路綫。称贊一些政治历史不清的分子“文化高、業務能力强”，是“好苗苗”、“台柱子”，給他們封官許願，提职提級，硬要把这些人拉入党內，並縱容包庇他們貪污、套購、走私等。他厭惡老幹部，罵他們是“老頑固”、“老狗当道”，要他們“騰板櫬”，鼓动青年“向老家伙开火”。他支持右派言論，包庇右派分子李韞章、張汝云等。他在大会期間，仍誣賴別人，向党反扑。

林里也是一个右派分子。他在政治上藏垢納污，变成了反革命的保鏢人。他在交通厅大量提拔、任用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几年来，他提拔了二十八个有政治問題的人，其中有十九个反革命分子。在肃反运动中，他利用职权，極力包庇这些反革命分子，以“留用人員，經過民主改革，已作了交代”，“历史罪恶已处理”等作借口，为他們开脫。他極力主張从輕处理已查出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他攻击肃反运动，夸大运动的缺点錯誤，抹煞运动的成績。在鳴放阶段，他以推举中心發言人“代表鳴放”，“大字报底稿要审查”，“要用真名实姓”，鳴放第二天就提倡爭鳴、反駁等手法阻撓鳴放。在反右派斗争中，总說右派排的多了，百分比大了。他不但不去挖掘右派，领导斗争，反而七十四天关起門为自己所受的处分写申訴書。他借口整風業務兩不誤，在反右派斗争最緊張的三个月里，先后召开了五次共三十八天大型業務會議，有意用这种办法挤掉反右派斗争。因此該厅虽有四十多个右派分子，但三个多月時間只定了三个，而且把不少右派分子划为左派，有的还担任了战斗小組長和整改副組

長。斗争極右分子楊子恒时他有意压抑群众斗志，使斗争軟弱無力，迟迟不得开展。

馬济川是一个只圖享受、做官不做事，違法乱紀、頹廢墮落的投机分子。审幹时一直拒絕向党写自傳；在他三进兩出党的关键上，不肯提出証明人。他对中央、省委的許多指示和決議不学习，不傳達，不貫徹执行，仅一次檢查即發現把四十二份电报积压九个月，並丢了五份。他拒絕省委对文化系統工作进行檢查。他不但不保証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針，而且放任“一鳴驚人”、“一本書主义”、“关門提高，爭取成名成家”等資产階級思想在文化艺术系統自由泛濫；他硬說“甘肃文化艺术系統沒有丁玲、陈企霞問題”，“不要硬搞”，“不然会毁灭幹部的”。他在文化系統私下封官許願、拉拉扯扯，培植个人势力，造成文化局幹部队伍的严重不純。

他严重失职，腐化墮落，打人罵人，貪污浪費（借用公款六百八十多元，擅自在事業費內作了报銷）。在这次大会上，对于同志們的批判滿不在乎，不仅沒有悔改的表現，而且沒有檢查的誠意。

鑒于这些人已經离开了馬克思列寧主义立場，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变成了党和人民的敌人，因此大会一致決議：把右派集团分子孙殿才、梁大均、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曹又参，右派分子林里和階級異己分子梁克忠，投机分子馬济川清除出党，撤銷他們党内一切职务，向党内外公布，並且建議有关方面撤銷他們的行政和其他职务。

代表大会指出：陈成义对党是有罪的，他幹了許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情，本应組織上給以严厉处分，但鑒于他已經死了，因此，決議只在党内外公布他的罪惡事实，进行批判，不再作組織处理。

我們和孙、陈、梁右派集团之間的激烈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內的反映。

这次大会彻底粉碎了孙、陈、梁右派集团，使党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一个大胜利，这个胜利将加速社会主义事业在甘肃的胜利发展。党内出现孙、陈、梁右派集团，这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我们揭发和粉碎了这个集团，解决了这个矛盾，并使全党受到了生动的教育，便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由于这个右派集团的主要分子都有较长的革命历史，担任着党政机关的重要职务，既可以利用职权公开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又可以利用地方主义网罗人、煽动人进行反党活动。因此，对党的危害就特别严重，而揪出这伙暗藏的敌人，意义就特别重大。从这个斗争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个严重教训：“发亮的并不都是金子”，必须经常提高革命警惕性。要时常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所在，经常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这次大会上，揭发和清除了孙、陈、梁右派集团和其他反党分子，这是我们巩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地方主义在甘肃的影响还是广泛而深远的，个人主义思想在某些干部中、党员中也是严重的。因此，继续开展反对地方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就是当前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反对地方主义时，必须把利用地方主义来进行反党活动的人；和受地方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应该看到：坚持地方主义立场进行反党活动的，只是极少数的人，而大量的则是政治觉悟不高，有地方主义情绪，因而不自觉地犯了一些错误，这些人经过党的教育，一般的很快就可以改正的。还应该指出：地方干部对于地方的热爱，干部之间的友谊来往，党员及时向党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和各地区的特点，对工作中某些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这些都是党内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是不应该反对的。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會議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楊效椿、 李銳党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通过)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會議，徹底揭露了李世农(省委書記处書記、副省長)、楊效椿(省委委員、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檢察長)、李銳(省委委員、省副檢察長)、陈仁剛(原省司法厅党組書記、副厅長，已开除党籍，撤銷职务)等人的反党集团，粉碎了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这是我們党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对于純潔党的組織，巩固党的团結和統一，巩固人民民主專政，促进社会主义事業的發展，有極為重大的意义。

这个反党集团的罪行是極為严重的。長期以来，他們陰謀破坏人民民主專政，危害党的組織，反对党的方針、政策。当去年五月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瘋狂进攻的时候，他們的反党活动达到了最高峰。

根据會議揭發：李世农是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腦，他伙同他的爪牙，利用职权，寬縱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为了遂行其寬縱反、坏分子的罪行，他篡改了党的肃反方針和政策，把鎮压与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改变成为只要寬大，不要鎮压；把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方針，改变成为有反不肃、無錯也糾。他还經常散布取消肃反斗争、为反革命开脫罪責的謬論，說什麼“殘余反革命保險一个也找不到”、“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性愈来愈弱了”、“反革命分子有兩面性”、“反革命分子在我机关多做一年工

作，等于多贖一年罪”。他甚至亲手制定一些該判不判、重罪輕判的案例，令各地仿行。据初步統計，經過李世农罪惡指導，全省放掉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達二千余名之多。由于李世农一貫罪惡活動的結果，使不少幹部受到了毒害，使政法部門產生了普遍而又嚴重的右傾傾向。

一九五七年初，省委鑒于政法部門右傾思想嚴重，決定展開批判。當時李世农採取兩面手法，在省委會議上不表示意見，背後却指揮他的爪牙陳仁剛、楊效椿、李銳等有計劃地到各地“查錯反左”，搜集反黨材料，並通過檢察系統在全省普遍登記黨委建議處理的所謂錯案，尋找岔子，煽動政法幹部反對省委的反右傾決定，向黨發動猖狂進攻。他們明目張胆地誣蔑省委提出反右傾之後，下面“搞得很糟”，不許政法部門將省委反右傾指示下達，號召政法幹部要“堅持原則，不要怕摘掉烏紗帽”。去年大放大鳴期間，他們的反黨氣餒更為囂張。李世农在全省政法會議上，公然攻擊省委的反右傾方針，否定反右成績，他叫囂：

“反右發生了偏差，省委要負主要責任”，講反右成績是主要的，這是個“老公式”。公開挑撥政法幹部與黨委的關係，煽動政法幹部與黨委對抗，他把各級黨委對某些政法幹部右傾思想的正確批評，說成是“黨委過分責備政法幹部”，他誣蔑黨委搞錯了案件，並要黨委向政法幹部“承認錯誤”。他為了遂行其反黨活動，還散播了“合作化後，已經沒有兩條道路鬥爭”，現在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今後鬥爭只是“新舊思想的鬥爭”，資產階級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自己階級的志願”等等反動謬論，企圖以此取消階級鬥爭，取消無產階級專政。

不僅如此，李世农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一貫違抗中央的方針政策，破壞黨的統一領導。在土地改革時期，他庇護地主階級利益；在合作化時期，他堅持資本主義道路；在生產和救災方面，他反對生產改革和生產自救的正確措施；在建黨工作和幹部工作方面，他歪曲建黨原則，破壞黨的純潔，為反、壞分子大開

方便之門；他篡改黨的審幹原則，寬縱叛徒和自首分子，把這些人的審查結論中的嚴重政治情節刪去，甚至將“对党不忠實”改為“对党忠實”；他一貫包庇壞人壞事，對一些嚴重違法亂紀分子，百般掩蓋，多方照顧。他蓄意破壞黨的統一，誹謗省委領導同志，煽動幹部反對省委，陰謀篡奪省委領導；他培植個人勢力，實行派別性的幹部政策，拉攏落後分子，凡对党不滿的人，他都同情和支持。

李世農為着施展他的反黨陰謀，還運用了剝削階級的那套權術，一貫採取兩面手法，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甚至以“模範黨員”自封。他長期隱瞞黨對他的處分，吹噓自己“德有餘而才不足”。而且偽裝朴素，假冒忠厚，把自己打扮成為一個十足的克己奉公的正人君子。他就是这样來騙取組織、騙取群眾信任的。

楊效椿、李銳是李世農反黨集團的兩員主將。他們長期相互勾結，相互包庇，相互捧場。除上面已說到的那些事實之外，會議還揭發了楊效椿、李銳的許多罪行。

楊效椿親手寬縱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一百餘名，錯誤地釋放了大批被勞動教養的人，並且誣蔑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他包庇右派分子，甚至公然提拔已經暴露的右派分子，擴充其反黨勢力。

李銳長期隱瞞惡霸地主的家庭情況，解放後，又極力包庇負有血債的幾個惡霸哥哥，並給他們安插工作；他還將不少反、壞分子引進國家機關，甚至對明顯的右派分子加以提拔。他常常借口“人民內部問題”、“犯罪未遂”、“後果不嚴重”等等，拒絕批准逮捕和起訴，為大批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開脫罪責，並親手寬縱了三十餘名罪犯。他一貫抗拒省委決定，把省檢察院變成獨立王國，並竭力煽動檢察幹部反對黨的領導和監督。他陰謀改變國家檢察機關的性質，甚至公然宣稱檢察機關是保護犯人的。

會議一致指出：以李世農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陰謀活動，並不

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李世农、李銳都出身于地主家庭，虽然党对他们进行了长期教育，但他们一直拒绝改造，他们的剥削阶级本质，毫无改变。李世农在土改时会說：家庭被划为富农（实际是地主），土地没收，思想为之一动，李銳在反匪反霸中，曾为恶霸家庭受到清算而痛哭流涕。这就是他们那种剥削阶级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在民主革命时期，李世农、李銳虽然百般伪装，混过了关，但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反动本质，亦有所表现。李世农在抗日战争初期，把党所组织的武装送给了封建势力。在解放战争中，他在淮南工作时，又退却逃跑。李銳也和李世农一样，犯过逃跑主义的错误，他曾在战争紧急关头，放弃自己负责的工作地区。楊效椿系富农家庭出身，入党后，由于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当个人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就由对党不满，仇恨党，与党对立，终于蜕化变质，走上反党道路。正是由于他们有的坚持反动立场，有的蜕化变质，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勾结起来，组成反党集团。当着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激化的紧要关头，他们的反党活动就更加露骨，更加嚣张，他们的反动面目也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去年春天大鸣大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不甘心于剥削制度的死亡，向党发动疯狂进攻，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也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同时在国际上，由于帝国主义利用匈牙利事件掀起了反共高潮，修正主义思潮一度猖獗，他们竭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党的领导、诽谤马列主义。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情况下，李世农反党集团从他们的剥削阶级立场出发，利用党外右派分子进攻的声势，借助于修正主义的謠言，就向党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更为恶毒的进攻。所以，这一反党集团的形成，以及他们的反党活动在去年五月达到了高峰，是不足为奇的。这是他们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必然结果，这是国际国内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们的反党活动是资产阶级右派对党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无情地证明了：他们完全是一

伙長期隱藏在黨內的陰險的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

當李世农、楊效椿、李銳的反黨陰謀尚未暴露之前，黨曾對他們的錯誤，特別是對李世农、楊效椿的錯誤進行過多次教育的。對李世农在抗日戰爭時期所犯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和在解放戰爭中所犯的逃跑主義的錯誤，黨就給予過批評和處分。在解放以後，對他在重大問題上態度曖昧，包庇壞人，矯揉造作，自封“模範”等錯誤，又一再進行了批評。特別當去年秋季發現他包庇右派分子陳仁剛和一些不正常現象以後，黨又多次對他進行過尖銳的批判。對楊效椿的錯誤，在大會揭露以後，省委還力圖挽救他，省委負責同志曾親自和他兩次談話，要他愛惜自己的歷史，和李世农划清界綫，回到黨的立場上來。儘管如此，但是他們一直抱着抗拒態度，毫無悔改之意，這就說明他們決心和黨和人民對立到底。

會議一致認為：李世农、李銳和楊效椿是混入黨內不堪改造的階級異己分子和不可救藥的蛻化變質分子，是黨內的右派。大會一致決議：開除李世农、楊效椿、李銳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的一切職務，並建議有關方面撤銷他們黨外的一切職務。

會議一致指出：徹底粉碎以李世农為首的反黨集團，是安徽黨組織內兩條道路鬥爭的重大勝利。為了鞏固全省黨組織在黨中央領導下的團結和統一，純潔黨的組織，增強黨的戰鬥力，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應當從下列幾個方面切實努力：

第一、革命嗅覺和警惕性必須提高。每個黨員一定要堅決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加強政治責任心，提高革命警惕性，全心全力保衛我們的黨，全心全力保衛人民民主專政。以保障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對於一切危害黨、分裂黨、破壞黨的行為，對於一切破壞人民民主專政的罪惡活動，必須及時揭露，堅決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反對溫情主義、自由主義和麻木不仁的態度。

第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必須嚴格遵守。每個黨員一定要在集中指導下正確運用民主權利，充分發揚積極性、創造性，在黨

的政治生活中勇于批評和發表意見，敢于爭辯和堅持真理。同時必須在民主基礎上實行高度集中，遵守黨的統一領導原則、維護黨的團結，巩固黨的紀律。任何問題，一經黨的組織作出決議，必須無條件執行，決不允許陽奉陰違，背後自搞一套。對於那種破壞民主集中制原則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必須進行堅決鬥爭。任何黨員，都必須受到黨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嚴格監督。

第三、共產主義人生觀必須確立。每個黨員一定要努力加強党性鍛煉，不斷提高共產主義覺悟，培養大公無私，勤勤懇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必須加強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思想改造，堅決克服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反對爭名譽、爭地位、爭待遇、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特別是那些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黨員，更必須加強對自己的改造，使自己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

第四、中央的方針政策必須堅決執行。每個黨員一定要認真研究中央的方針政策，做到學深、學透、學全，不斷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保證做好黨的一切工作。任何時候，對於中央的方針政策，必須忠實執行，決不容許斷章取義，決不容許擅自修改。對於那些歪曲、篡改和背离中央方針政策的行為，必須及時進行堅決的鬥爭。

第五、馬列主義水平必須提高。每個黨員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學習，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唯物辯證法，學會認識事物發展的規律，不斷提高政治理論水平，提高識別能力。只有正確地掌握無產階級的思想武器，才能在工作中避免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毛病，才能有力駁斥修正主義調調和各式各樣反馬列主義的謬論，堅強地保衛馬列主義原則。

我們相信，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這次會議勝利的基礎上，全省黨員一定能夠接受這一事件的深刻教訓，更緊密地團結起來，發揚革命朝氣，團結廣大人民，為促進和完成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努力奮鬥。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 第六次全体會議关于开除右派分子 魏心一党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通过)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會議徹底揭發和批判了省委委員、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魏心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並且一致認為魏心一已經墮落成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會議揭發的大量事实証明：魏心一是省文联右派集团反党的策划人和指揮者，他和右派分子戴岳早已結成了反党联盟。省文联右派集团以林洛里“什么思想在領導‘江淮文学’編輯部”的批評文章（編者按：这是林洛里同志写的一篇批評“江淮文学”編輯部資產階級思想作风的文章）作为反党由头，用修正主义的观点来曲解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作为反党的“理論”根据，把党的原則斗争誣蔑为宗派斗争，作为反党的策略手段，將所謂“先剃自己的小辮子，后抓別人的小辮子”作为反党的行动步驟，都是出之于魏心一的策划和指揮。魏心一在林洛里的批評文章發表之前，即暗中作了反党的布置，他指使戴岳作假檢查报告去蒙蔽省委，抵抗党对他們的正确批評。林洛里文章發表时，魏心一正在北京出席全国宣傳會議，他利用这个机会，一面向中央宣傳部謊报省文联情况，企圖騙取支持；一面电告戴岳，妄称“林洛里批評和中央宣傳會議精神不符”来煽动省文联右派集团的反党气焰。魏心一从北京回来后，又直接指揮和煽动他們在省委召集的宣傳和文教部門的會議上，一次又一次地向党猖狂进攻，而他本人在这些反党活动中則採取了兩面手法，会上一套，

会外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这个人面前一套，在那个人面前又一套，手段是極為陰險毒辣的，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極其严重的。在相当長的一段时间內，魏心一戴岳反党联盟窃据了安徽文艺界的領導职位，篡改了党的文艺方向，使党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刊物“江淮文学”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当魏心一的反党陰謀还未暴露以前，省委对他包庇右派分子戴岳的行为，曾多次批評，並責令其檢查和交代，他不仅一直拒不交代，反而变本加厉，要戴岳坚持反党立場。由此可見，魏心一是一个坚决与党对抗到底的右派分子。

魏心一是出身于小資产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入党后長期拒絕改造，極端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斷發展，終于滾入資产階級右派的泥坑。他一貫把自己負責的部門和地区，看做是自己的独立王国。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苏北鹽东县任縣長时，就擅自槍杀了無辜的通訊員毛小根同志。一九五〇年他任六安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时，上級党報批評了他領導下的一個工作人員，他竟向各县、区發出通報，对上級党報进行攻击。一九五三年他任徽州地委書記时，違反党的方針，擅自决定砍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業社。他任省委文教部長后，独立王国的思想更加發展，他想把文教部門造成魏家天下。他不但反对省委文教部和宣傳部合併，甚至以辞职不幹，要挾組織。他在工作中常常不請示省委就擅自决定重大問題。对被領導的同志，他或則作威作福，以表示自己的無上权威；或則封官許願，拉拉扯扯，企圖培植个人势力。他領導的部門和工作，不許任何人批評和过問，如果未經他同意而批評他領導下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單位时，他都認為是对他的个人权威的侵犯，因而深怀不滿甚至視若讎仇。

會議認為魏心一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是極其严重的，一致決議，撤銷右派分子魏心一一切党内职务，开除其党籍，並建議有关方面撤銷他的一切党外职务。关于他擅杀通訊員毛小根同志問題，則提交司法机关徹查处理。

的，这是广泛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反党集团首脑之一郑敦，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入党后长期坚持其剥削阶级思想，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反封建斗争中动摇消极，但却热衷于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党讲价钱，离心离德。云南解放前他即怀着抢地盘，发展个人的野心，进行许多非法活动。解放后全省党的组织在中央领导下进行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中，郑敦以两面派的手法，从事欺瞒党和培养个人势力的活动。被省委察觉并且严格批评之后，表面上暂时收敛，内心却更加仇视党，并且继续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反党活动。反党集团另一首脑王镜如，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入党以后长期不愿自觉地改造自己，一直保持，珍惜甚至欣赏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常恬不知耻地宣扬他“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向来以抗上为荣”，目无组织，横行霸道。一九五五年底省委酝酿下届委员的选举中，郑敦怀着当省委书记的野心，王镜如怀着当组织部长的野心，进行非法活动。当他们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对党不满更加发展，在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活动、共同的密谋策划下结成集团，在全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阶级斗争剧烈尖锐，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严重关头，利用了某些干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连续地向党发动恶毒的攻击。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就有两次疯狂的总攻。

第一次总攻针对着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县、市和省的党代表大会。他们一方面背着省委，违犯省委“通过党代表大会，动员全党实现党的政治任务——总结合作化，反对右倾保守，鼓起干劲，貫徹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方针，鼓吹极端民主化，鼓吹各县党代表大会“中心是发扬民主”只字不谈生产，用诬蔑、丑化的手段打击以外来干部为主的土改以来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分裂党的团结，企图按照他们的面目去改组县委。另一方面，他们在各县党代表大会已经制造了若干混乱思想之下，毒化省党代表大会的气氛，对省党代表大会实行突然袭击，进行非法活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关于 开除右派分子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彻底揭露了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和组织部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批判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胜利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使全省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周围，密切地联系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反党集团是一个有目的、有纲领、有组织的阴谋集团。他们一切阴谋活动的目的是篡夺党的领导，改变党的性质，为资产阶级复辟开辟道路。他们的纲领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修改党的全部原则，取消党的领导；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这个反党集团以郑敦、王镜如为首，聚集着一批已经揭发的如臧野农（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处长）、袁用之（省建筑工程局处长）等骨干分子和一批党内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有计划地向党举行进攻。

这个反党集团是在一九五六年初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形成

的，这是广泛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反党集团首脑之一郑敦，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入党后长期坚持其剥削阶级思想，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反封建斗争中动摇消极，但却热衷于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党讲价钱，离心离德。云南解放前他即怀着抢地盘，发展个人的野心，进行许多非法活动。解放后全省党的组织在中央领导下进行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中，郑敦以两面派的手法，从事欺瞒党和培养个人势力的活动。被省委察觉并且严格批评之后，表面上暂时收敛，内心却更加仇视党，并且继续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反党活动。反党集团另一首脑王镜如，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入党以后长期不愿自觉地改造自己，一直保持、珍惜甚至欣赏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常恬不知耻地宣扬他“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向来以抗上为荣”，目无组织，横行霸道。一九五五年底省委酝酿下届委员的选举中，郑敦怀着当省委书记的野心，王镜如怀着当组织部长的野心，进行非法活动。当他们的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对党不满更加发展，在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活动、共同的密谋策划下结成集团，在全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高潮，阶级斗争剧烈尖锐，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严重关头，利用了某些干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连续地向党发动恶毒的攻击。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就有两次疯狂的总攻。

第一次总攻针对着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县、市和省的党代表大会。他们一方面背着省委，违犯省委“通过党代表大会，动员全党实现党的政治任务——总结合作化，反对右倾保守，鼓起干劲，贯彻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方针，鼓吹极端民主化，鼓吹各县党代表大会“中心是发扬民主”只字不谈生产，用诬蔑、丑化的手段打击以外来干部为主的土改以来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领导核心，分裂党的团结，企图按照他们的面目去改组县委。另一方面，他们在各县党代表大会已经制造了若干混乱思想之下，毒化省党代表大会的气氛，对省党代表大会实行突然袭击，进行非法活

动，散布流言蜚語，企圖操縱选举，以便从上面篡夺领导。在省委和各地、市、县委和大多数正直有觉悟的党员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的努力下，这次进攻虽然並未得逞，也确已造成党内一定时期的思想混乱。但他们並未甘心，省党代表大会后，他們以总结党代表大会为名，不理會省委的制止，發文件通报各地党的組織，以“不民主”和“反中央”的罪名繼續向省委进攻。

匈牙利事件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开始向党进攻，这个反党集团也就異常敏感地立即开始了他們对党的第二次总攻。他們到处搜罗和夸大农村的“陰暗面”，把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农村描画成“黑漆一团”，他們發动和支持党内外的不滿分子、坏分子以至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翻案。上自省委下到基層，他們辱罵党是“特殊化”、“特权集团”，以至煽动学生和幹部上大街打倒“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这次进攻的頂点是他們發动省委組織部的右派分子張貼攻击省委的反党大字报。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郑敦、王鏡如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撓和破坏，組織退却；为他們的骨幹分子和組織部內的右派分子开脫，或者說“組織部沒有右派”、“某某人不是右派”，或者以調下乡为名为他們回避、隱蔽。郑敦被下放到县后，他与王鏡如之間还經常共同策划，分头执行，企圖保存实力。

从一九五四年以来，省委对郑敦、王鏡如这两个野心家的陰謀活动从未放松过警惕，曾經和他們进行过無數次的斗争，对他們提出过严重的警告，並且無數次地企圖使他們悔改转变，直到最后揭露斗争之前，还不放松这种努力。但他們从资产阶级的本能出發，利令智昏，坚持反党到底。每遇到一次打击，他們的兩面派手法就更加隱蔽和陰險。在党的組織和會議面前，他們把自己的真正面貌掩盖起来，把自己裝飾做党的路綫的拥护者，背着省委，他們又欺騙下級，假借省委的名义，歪曲党的方針、原則，販賣与省委的决定完全針鋒相对的反党私貨。资产阶级右派的尾巴終究是不能長期掩盖得住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政治战綫和思想

戰綫上的階級鬥爭尖銳起來的時期，社會上刮起了妖風，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與黨內外右派分子一起向黨發動了瘋狂的進攻，終於原形畢露。

(二)

鄭敦、王鏡如反黨集團，根據他們的反動綱領，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

一、為了篡黨，他們把黨所委託他們管理的部門、事業和黨的幹部霸為私產。他們控制省委組織部為基地，到處擴張勢力，安設據點。自一九五三年起，鄭敦即在省委組織部組織反黨力量，打擊排斥部內忠實於黨的幹部。王鏡如加入反黨集團後，二人即共同策劃、狼狽為奸，收羅、拉攏或欺騙一批品質惡劣的分子以至壞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或者未經改造意志薄弱的幹部，培養私人勢力；同時，更為狠毒地打擊和排斥忠於黨的幹部，特別是經過考驗的老幹部。組織部在肅反和整風運動中已經清查出來的四個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八個右派分子，幾乎都是他們親自培養提拔起來的親信。他們依託這個障地，與省委分庭抗禮，採取下鄉巡視，派工作組試點，開業務會，訓練班，打電話，發通報等方式，歪曲省委的指示，販賣反黨私貨，非法地越權發布與省委決定針鋒相對的指示，干涉各級黨委的工作。他們利用組織部的有利地位，欺騙省委，在他們所可能鑽空子的地方安插重用親信和可以被利用的分子。只是由於省委嚴格控制和不斷警惕，不斷打破了他們到處扎釘子的陰謀。他們頑強固守的基地，最後也不得不被粉碎。

二、他們從根本上反對黨挑選幹部的德才兼備的政策，幹部團結的政策，“有經驗的老黨員、老幹部和帶着新鮮血液富有朝氣的新黨員、新幹部相互協力”（毛澤東選集卷二“共產黨人”發刊詞）的政策。他們利用地方主義的遺留影響，惡毒地挑撥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團結，挑撥新老幹部的團結，挑撥工农幹部與

知識分子幹部的團結。他們針對着我省地下斗爭時期建黨路線錯誤與和平起義所帶來的幹部成分複雜，有經驗的老幹部非常少，因而外來老幹部特別重要的特點，他們就特別着重打擊、排斥陷害老幹部，在基層則極力排斥工农出身的基層幹部，辱罵老幹部“沒有文化，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應該“退休”、“進博物館”，要對老幹部實行“贖買”政策，甚至假審幹之機無中生有地中傷陷害若干主要領導幹部。這種毒辣的摧毀黨的骨幹的陰謀，目的是要從根本上斷送黨的命脈。黨從來珍貴老幹部，因為他們是革命事業的保證；同時也珍貴經過斗爭鍛煉的新的工农幹部和經過改造的新的知識分子幹部，而且把培養大批新幹部作為自己的重大責任。但是，鄭敦、王鏡如反黨集團吹捧一些未經改造的知識分子和有着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能說會寫”、“有才能”，加以提拔重用，並且要他們擺開老骨幹的帶領和幫助，目的無非是為了培養自己的反黨勢力。他們甚至不惜用封官許願、縱容煽動以至請客吃飯等卑鄙手段，收羅一些犯有嚴重錯誤毫無悔改、蛻化變質、對黨不滿的分子，甚至異己分子和壞分子，擴充反黨勢力，以實現他們的政治野心。在某些場合，他們也曾利用某些人的地方民族主義思想，在民族幹部中進行非法活動。所有這些，充分暴露鄭敦、王鏡如反黨集團是從根本上反對黨的幹部政策，實行着徹底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的幹部政策。

三、這個反黨集團煽動極端民主化，從各个方面根本修改黨的全部組織原則。他們反對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幾年來一直鼓吹“部門分工”、“黨政分工”、“黨社分工”，要求黨委部門應有決策權利，反對黨委“包辦”和“干涉”政府工作，反對支部“干涉”合作社的工作，非法通知規定鄉人民委員會和合作社管理委員會中黨員只應佔三分之一。一切陰謀在於企圖取消黨的領導，把黨變成資產階級議會黨團。他們反對黨的民主集中制，鼓吹“無限制的民主”、“不拘形式的發揚民主”，

目的是企圖在黨內製造混亂，便于他們混水摸魚。他們反對集體領導與個人作用的統一，集中地反對各級黨委第一書記的作用，捏造“書記十大罪狀”、“委員十大苦悶”，誣蔑書記“專斷”、“不民主”、“是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罪惡淵源”，目的在於削弱黨委的領導核心，使黨的各級組織陷於癱瘓，而便于野心家的篡奪。他們反對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鼓吹下級“頂”上級、部門“頂”黨委，鼓動部門向黨委要“獨立權力”，目的在於使部門各自成為獨立王國，使黨委成為資產階級的行業公會。在他們的基地組織部內部，他們就是利用極端民主化使堅持原則忠實於黨的幹部無可作為，使他們的黨羽橫行霸道；在他們所煽動的許多縣、市的以及廠礦、學校的黨代表大會上，這種邪惡的修正主義傾向會使得這些黨組織內發生一度的思想混亂。

四、這個反黨集團和所有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樣，幾年來堅持不懈地和黨爭奪農村陣地，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地進攻黨的農村組織，反對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當土改結束急需在農村建黨，以便鞏固土改的成果和立即領導農民進入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頭，他們對農村的建黨工作實行怠工。農村支部普遍建立以後，省委適應當時的政治任務和組織狀況，提出改變農村組織形式和領導方式，加強支部的領導作用，逐步撤銷工作隊，加強縣委對支部的直接領導，培養支部的工作能力。他們卻歪曲省委的方針，辱罵工作隊和老幹部，誣蔑他們不懂黨的組織原則，是“包辦代替、強迫命令的老祖宗”，下令強調立即撤銷工作隊，其目的在於割斷以老幹部為核心的工作隊與新建立起來的支部的聯繫，同時他們強調縣級機關“正規化”，以反對“縣委五個部門上了五把鎖”為名，反對縣級機關深入基層領導生產合作。這都是為了便于他們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去改造黨的農村基層組織。一九五五年秋天，省委根據中央指示，布置了為肯定和發揚積極性迎接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而整黨。他們卻把農村支部說成是黑漆

一團。誣蔑農村黨員“普遍有退坡思想，划不清敵我界限，百分之四十至七十不想幹”，企圖以此來證明“農民不贊成社會主義”、“支部不能領導合作化運動”，反對社會主義高潮。一九五六年春，農村基本上完成合作化之後，他們又強調“黨社分工”，要合作社實行“一長制”，要支部不抓生產，企圖使支部從根本上脫離群眾，使合作社自生自滅以致解體。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和農村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向黨進攻時期，他們配合右派分子的進攻把農村說成是黑漆一團，捏造“十大矛盾”、“十大緊張”，是社會主義改造太快的結果；他們還散布“無敵論”，歪曲說：農村的基本矛盾是基層幹部與群眾的矛盾，也即是“黨與群眾的矛盾”，把農村支部誣蔑成一個脫離群眾的特殊化的集團。因此，在右派猖狂進攻中他們堅持要整黨，要反支部的特殊化，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里應外合地向黨進攻，企圖把支部完全整垮。很明顯他們知道農村戰綫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決戰場，他們的目的是反對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農村社會主義生產大躍進，取消工農聯盟，取消黨對農村的領導，取消農村的人民民主專政，為資產階級復辟開辟道路。

幾年來，不論在會議上、在實際工作中，或個別談話中，鄭敦、王鏡如反黨集團在對待農村問題上的陰謀，每次都被省委識破和嚴厲地駁斥，但是他們始終不甘心，頑強地一貫地堅持與省委對立。

五、鄭敦、王鏡如反黨集團為了根本反對社會主義，他們曾經違背省委肯定成績、保護與發揮幹部和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方針，在農村叫囂反“冒進”，到處尋找和夸大黑暗面，以證明“合作化太快”，“合作社一團糟”，證明社會主義不能前進。惡毒地攻擊一九五六年大姚縣黨代表大會一致通過的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和三年基本上實現水利化的決議，為“盲目冒進”，為“強制通過”、“不民主”。直至今年大躍進中，他們還制止幹部和群眾興修水利、改水田，強令糧食退庫。

社会主义事業的罪惡活动，保衛党的团結，保衛人民民主專政，以保障社会主义事業的胜利。

第二、肃清一切修正主义傾向，反对資产階級民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放手發動群众，充分發揚群众路綫的党的光荣傳統，發揚無产階級的民主。必須充分揭發資产階級“民主”的欺騙性和反动性，必須充分揭發“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于損傷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負不起斗争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毛澤东 选集 卷一“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必須揭破：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資产階級复辟服务的資产階級民主，就是为巩固無产階級專政、促进多快好省的建設社会主义的無产階級民主。每个党员必須提高覺悟，提高識別能力，不要作資产階級的“民主”、“自由”的花言巧語的俘虜。我們主張領導与群众相結合，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相結合，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既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潑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無产階級的民主，正是消灭了資产階級民主的結果。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資产階級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們必須發揚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以抵制任何修正主义傾向。

第三、地方主义是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血兒，必須徹底肃清。解放后，地方主义曾經成为土地改革的阻碍力量。省委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綫，經過整党克服地方主义，从思想上团結了大多数，形成以外来幹部为主的領導核心，使土地改革得以順利完成，大多数地方幹部也得到提高。而且經過八年斗争中联系群众，極大多数外来幹部也已經本地化，成为党在云南的革命事業的可靠支柱。但是由于过去的整党是在民主改革的条件下进行的，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地方主义的遺留影响仍然存在，以致郑敦能够利用这个影响来作为反党的重要工具。全体党员應該从这次斗争中吸取教訓，徹底肃清地方主义的遺留影响。

要在党内和群众中深入宣傳共产主义的原則，使每个人都認識地方主义是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民族主义、宗派主义都是資產階級傾向，也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也必須加以批判。党的幹部政策的最高原則不是地方化，而首先是共产主义化。每个幹部都應該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覺悟，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一道建設社会主义。每个黨員都應該積極維護党的領導核心，維護党的團結和統一。

第四、必須克服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觀。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凡有个人主义而又不能自覺地進行斗争的人，都念念不忘个人的名譽地位，向党伸手。當他們無止境的个人慾望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就必然对党不滿，以至於一步一步地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每个黨員都應該从与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作斗争中吸取教訓，加强党性鍛煉，提高共产主义覺悟，加强自我思想改造，坚决克服一切爭名譽、爭地位、爭待遇，斤斤計較个人得失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培养大公無私、勤勤懇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貴品質。

最后，必須把“多快好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作为建設社会主义中照耀一切的灯塔。各級党的組織，每个幹部，每个黨員都要把組織性与創造性，革命幹勁与深入的鑽勁結合起来，对組織要时刻老老实实，在工作上要永远生龙活虎，又紅又專，永远成为社会主义建設的革命派、促进派。对于来自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任何誣蔑和攻击，要敏銳地給以反击。对于同志中思想迷惑，消極畏縮，勁头不足，官气、暮气等等保守傾向，要坚持“團結——批評——團結”加以批判和克服，發揚積極性，正确地維護与坚持党的路綫。

省委第六次全体（扩大）會議完全相信：在揭露和粉碎郑敦、王鏡如反党集团的胜利基础上，全省黨員只要能够認真地接受深刻的教育，提高覺悟，我們一定能够紧密地團結在完全可以

信賴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大躍進創造新的偉大的勝利。

中共河北省委第五次全會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洪濤党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通过)

中共河北省四級幹部會議和河北省委第一屆第五次全體會議，徹底揭發和批判了省委統戰部長刘洪濤（省委常委）罪惡的反党活動。这是河北省黨組織在社会主义道路同資本主义道路斗争中的一次重大勝利。这个勝利，对于加强党的團結和統一，維護党的紀律，提高党的战斗力，有着極其重要的意义。

刘洪濤是一个極端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他的濃厚的个人名利欲望是永远不能滿足的，也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正因为如此，他就从卑鄙的名利观点出發，長期对党不滿，以致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党的道路。去年夏季，当資產階級右派利用我党整風时机向党發動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以为实现他的个人野心的条件成熟了，便和党外的右派分子站在一起，里应外合，向党进行了惡毒攻击。特別是在去年八月省人代会反击右派分子王葆真的斗争中，他使用了資產階級的各种卑鄙手段，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動，破坏省委的決議，破坏反右派的斗争。身为省委常委、統戰部長、省政协副主席的刘洪濤，就这样甘心充当了資產階級右派在我們党內的代理人。

刘洪濤在去年大鳴大放期間和右派分子王葆真結成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党联盟，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王葆真在去年三月全国政协会議上，借水利問題向党和人民政府發動了攻击，否定党

和政府几年来水利工作的巨大成就，誣蔑党和政府“虛擲”水利經費，給河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災害。刘洪濤对这种顛倒黑白的謠言不但不憤恨、不駁斥，反而倍加讚揚，百般叫“好”，並在去年五月省政协会議期間，与王葆真圖謀划策，結成联盟，企圖借口水利問題，混淆視听，迷惑群众，制造混乱，达到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目的。

当党和人民徹底揭露了右派分子王葆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並展开斗争的时候，刘洪濤不仅不幡然悔悟、低头認罪，向党交代，反而加紧活动，千方百計地包庇右派分子王葆真，掩盖他自己的反党罪行。在省人代会第六次會議期間，刘洪濤为了破坏大会对王葆真的斗争，隱瞞王的反动言行材料、多方为王进行辯解，煞費心机地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王葆真粉飾裝璜成“好人”，坚决反对在大会上对王进行徹底批判。在人代会对右派分子王葆真已展开斗争后，刘洪濤竟借其省委统战部長的身份，使用威胁手段，玩弄兩面手法，阻止其他同志对王葆真进行批判，妄圖挫伤人民代表对右派分子極端憤慨的斗争情緒。

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浪潮是不可阻擋的，人民代表的斗争意志是不能动摇的，右派分子的詭計是不可能得逞的。王葆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被戳穿了，右派分子的丑惡面目終于完全暴露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洪濤不仅沒有接受应得的教訓，幡然悔悟，放棄他的罪惡活动；相反的，却和王葆真暗中勾結，訂立攻守同盟，企圖頑抗到底。並为王葆真“申冤”，妄圖策动王葆真翻案。

根据刘洪濤一連串的反党活动的事實，省委全会一致認為刘洪濤已經完全背叛了党，墮落成为資产階級右派在我們党內的代理人。刘洪濤所以由一个“老”黨員，竟然墮落到这种地步，这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目前我們国家正处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資本主义所有制已經基本上被消灭了，資产階級作为一个階級正

在被消灭中，而资产阶级分子也正在被改造着。但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和熄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将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而且这种斗争不能不在党内反映出来。党内某些不坚定的分子，由于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不可免的要蜕化变质，走上反党的道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刘洪涛正是这样一个人。

党在当前历史时期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任务就是“兴无灭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现阶段的革命斗争中更加反动、更加卑鄙了，它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扫除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一些党员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共同思想基础。刘洪涛的头脑里充满了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长期背着“老资格”的包袱，骄傲自满，不求进步，喜人奉迎，厌恶批评，并一再向党伸手要名利地位。在他担任了统战部部長的时候，向党要省委委员；当了省政协副主席，又要副省长；选举“八大”代表时，又伸手要“八大”代表。他对自己这种名利熏心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竟称之为“毛遂自荐”。当他达不到个人目的时，就长期对党牢骚不满，还把这种牢骚不满叫做“不平则鸣”。由于他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欲望和他对于资产阶级的阿谀奉承特别感到兴趣和温暖，对党就更加离心离德了，以致发展到坚决反党的地步。

党对刘洪涛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恶劣品质早有察觉，曾对他进行过多次教育。早在传达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时，省委就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帮助；对他一再伸手向党要名誉地位和对党不满的情绪，也进行过严肃的批评和警告。但是他无动于衷。在去年八月省人代会期间，省委发觉他的反党行为后，又一再对他进行教育，希望他站到党的方面来。他没有听取党的劝告，却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党活动。人代大会后，省委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了他的反党罪行，他仍然避重就轻，躲閃敷衍。直至今年一、二月间四级干部大会对他展开了严肃地彻底地揭发批判，他

的蒙混过关的企圖被粉碎了，才被迫承認了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省委全会一致認為，刘洪濤已經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碼条件，为了巩固和純潔党的組織，維護党的紀律，提高党的战斗力，決議开除刘洪濤的党籍，撤銷他在党內的一切职务，並建議有关方面撤銷他的行政职务。

省委全会強調指出：刘洪濤反党活动的被揭發是河北省党組織的一个重大胜利。刘洪濤进行了卑鄙的反党活动，这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我們粉碎了他的反党活动，並在斗争中使党的組織受到了鍛煉和教育，这样，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全会要求全省党的組織和全体党员必須从刘洪濤的反党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訓，坚决做到：

一、必須加强党性鍛煉，同党內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断地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保持共产党员的大公無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貴品質，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觀。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是“万惡之源”，它和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是絕對不相容的，和党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具有严重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决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为党的偉大事業进行忘我的斗争，他們在政治上常常是不坚定的。微小的名利思想不加克服，就可能由小变大，以致在政治上完全墮落变质。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須坚决反对爭个人的名誉、爭地位、爭待遇，随时和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一定要保持兢兢業業、謙虛謹慎的优良作風；一定要發揚共产党员忘我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二、任何党员都必須無例外地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坚决执行党的決議，加强組織性紀律性。民主集中制是我們党的根本組織原則，它既保證全体党员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發揮；又保證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統一。每一个党员都必須坚持原則，發揮独創精神，在党的統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和斗争。在問題

沒有作出決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而且應該勇敢地自由地暢述己見；在作出決議之后，則必須無條件的執行，決不允許陽奉陰違，對於違反組織原則，破壞黨的決議的行為，黨的組織和黨員必須堅決與其進行鬥爭。

三、提高革命嗅覺和警惕性，堅決站穩工人階級立場。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認真地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和黨中央的政策，不斷地提高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武裝自己。同時，還要在複雜的階級鬥爭中切實鍛煉自己，做到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勇往直前，不使自己迷失方向。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善於識別香花毒草，能夠堅決地抵制和反擊資產階級各色各樣的思想影響，經得住任何風浪的衝擊，過好社會主義關，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到底。

中共河北省委第五次全會 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杜存訓黨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三日通過）

中共河北省四級幹部會議和省委第一屆第五次全體委員會會議，徹底揭發和批判了省工會聯合會主席杜存訓（省委候補委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這是在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問題上一場兩條道路的嚴重鬥爭。這一鬥爭的勝利，對於純潔鞏固黨的組織，捍衛社會主義事業，肅清資產階級右派對工人階級的侵蝕，有重大意義。

從會議揭發的材料證明，杜存訓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右派分子，是工人階級的叛徒，也是一個陰險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

杜存訓的反黨罪惡活動是極為嚴重的。最惡毒的是他打着“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招牌，集中地攻擊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方針路線，妄圖分裂黨與工人階級的關係，改變工人運動的社會主義方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正是在黨的領導之下，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才取得了偉大勝利，工人階級的历史地位才發生了根本變化，工人運動在社會主義事業中才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杜存訓對黨的領導和工人運動的成就極端仇視。他污蔑黨不懂“社會主義國家職工運動的方針”，不懂“社會主義國家工會的地位和作用”，攻擊黨“限制了工人運動的發展”。他別有用心地把黨和工會組織分割對立起來，千方百計挑撥黨和工會的關係，打擊和破壞黨在工人階級中的政治影響。這就徹頭徹尾暴露了杜存訓企圖篡改社會主義國家工會的性質和作用，篡改工會是黨聯繫工人群眾的紐帶的根本原則，企圖利用工會與黨分庭抗禮，以實現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目的。

杜存訓反黨罪行的另一突出表現，就是利用少數人的不合理要求和狹隘的經濟利益，來破壞工人階級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利益，並在工人階級內部製造分裂。我們黨是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最高利益的唯一代表者。黨從來是關心工人的切身利益的，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始終從六億人民出發，從社會主義總利益出發，來教育工人階級，把工人的目前利益與遠大利益結合起來。杜存訓則抓住“工人福利問題”，向黨向工人階級進行惡毒地攻擊。他竭力破壞黨關於合理調整職工工資福利的正確政策，用狹隘的經濟主義與資本主義思想來腐蝕工人的階級意識，把黨污蔑成實現工人階級利益的障礙，借以煽動和欺騙工人群眾，把鬥爭的矛頭引向黨。一九五七年夏季，與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緊相配合，杜存訓完全扮演了煽風點火，擴大矛盾，挑撥團結，製造混亂的罪惡角色，其目的就是要竭力煽動工人鬧事，利用工人鬧事來反對黨，以實現其個人野心，從而破壞社會主義事業。

該勇敢地自由地暢述己行，決不允許陽奉陰行為，黨的組織和黨員

急工人階級立場。每個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和黨產主義水平，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中切實鍛煉前，不使自己迷失方向，能夠堅決地抵制和反任何風浪的沖擊，过好到底。

次全会

黨籍的決議

通过)

第五次全体委员会会
杜存訓（省委候補委
義工人運動問題上一
對於純潔巩固黨的組
對工人階級的侵蝕，

隱藏在黨內的右派分
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

杜存訓的反黨罪惡活動是極為嚴重的。最惡毒的是在“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招牌，集中地攻擊黨對工人運導，攻擊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方針路綫，妄圖分裂黨與工的關係，改變工人運動的社會主義方向。黨是工人階級的隊，是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正是在黨的領導之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才取得了偉大勝利，工人階級的歷史才發生了根本變化，工人運動在社會主義事業中才發揮了作用。但是，杜存訓對黨的領導和工人運動的成就極端仇視污蔑，黨不懂“社會主義國家職工運動的方針”，不懂“社會主義國家工會的地位和作用”，攻擊黨“限制了工人運動的發展”。他別有用心地把黨和工會組織分割對立起來，千方百計挑撥工會的關係，打擊和破壞黨在工人階級中的政治影響。這就徹底暴露了杜存訓企圖篡改社會主義國家工會的性質和作用，改工會是黨聯繫工人群眾的紐帶的根本原則，企圖利用工會分庭抗禮，以實現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目的。

杜存訓反黨罪行的另一突出表現，就是利用少數人的不要求和狹隘的經濟利益，來破壞工人階級社會主義事業的利益，並在工人階級內部製造分裂。我們黨是工人階級和全國最高利益的唯一代表者。黨從來是關心工人的切身利益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始終從六億人民出發，從社會主義總利益出發教育工人階級，把工人的目前利益與遠大利益結合起來。杜則抓住“工人福利問題”，向黨向工人階級進行惡毒地攻擊竭力破壞黨關於合理調整職工工資福利的正確政策，用狹隘經濟主義與資本主義思想來腐蝕工人的階級意識，把黨污蔑成工人階級利益的障礙，借以煽動和欺騙工人群眾，把鬥爭的矛頭向黨。一九五七年夏季，與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緊相配合，杜存訓完全扮演了煽風點火，擴大矛盾，挑撥團結，製造混亂惡角色，其目的就是要竭力煽動工人鬧事，利用工人鬧事來攻擊黨，以實現其個人野心，從而破壞社會主義事業。

杜存訓同时还狂妄地攻击和詆毀人民政府，阻撓和抗拒政府法令的执行。他破坏政府威信，妄圖把工会凌駕于国家政权之上，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組織对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的支柱作用。

杜存訓为实现其政治上的罪恶目的，在組織上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破坏党的活动。他不断無中生有、無事生非地制造党内糾紛，任意歪曲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負責相结合的組織原則，借以抵制和反对省委的领导。他背着省委在省工会内部多次制造所謂“反宗派”斗争，打击敢于向他提不同意見的人，打击敢于向省委反映問題的人，並捏造、散布流言蜚語，攻击破坏党的领导。杜存訓企圖把省工会完全置于其个人統治之下，以便为所欲为地进行反党活动。

杜存訓为着施展其反党的罪恶陰謀，完全採用了剝削阶级的一套权术手段。他慣于制造矛盾，利用弱点，歪曲事实，借題發揮，借以打击別人，抬高自己。他經常採用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手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事实証明杜存訓是一个十足伪善的陰謀家。

全会認為，杜存訓墮落成为右派分子並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杜存訓是一个品質恶劣的極端个人主义者，他具有一套極其反动的资产阶级唯我主义世界觀。多年以来，他完全以个人利害为中心，以卑鄙的资产阶级观点，观察处理党的生活和党内关系，用剝削阶级損人利己的手段对待党和同志。他一向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从不把党的领导看在眼里。他不是个人服从組織，而是要挾組織服从他个人，企圖以他个人的面貌来改造党。杜存訓热衷于个人权势，达不到个人目的，就仇視领导，与党对立。杜存訓虽經党的多年教育，但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質根本沒有得到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杜存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惡面目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墮落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的

代理人。

杜存訓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一系列的反黨罪惡活動，對黨和工人群眾的侵蝕，對工會工作的危害是極其嚴重的。經過全省四級幹部會議和省委全會的揭發和鬥爭，杜存訓對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百般狡賴，始終沒有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為了維護黨的原則，純潔黨的隊伍，捍衛工人運動的社會主義方向，全會一致決議，開除杜存訓的黨籍，撤銷其黨內一切職務，並建議有關方面撤銷其一切行政職務。

全會一致指出：徹底粉碎杜存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是河北黨組織在兩條道路鬥爭中一場重大的勝利。全會號召各級黨組織、全體黨員和全體工會幹部，要從這一鬥爭中吸取有益的教訓。

一、必須堅持黨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絕對領導。從我黨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國工人運動始終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展壯大和取得勝利的。我國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無數歷史經驗證明，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就沒有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資產階級右派和工人階級叛徒，為了反對和破壞社會主義事業，反對和破壞工人運動，首先就是千方百計反對黨的領導。因此，各級工會組織和全體工人階級，要堅決維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維護工人運動的社會主義路綫，維護黨和工人階級的團結，防止敵人從外部和內部破壞工人階級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切企圖。

二、必須加強黨對工會的政治思想領導和對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我們黨從來就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工人階級。我們工人階級在黨領導之下，完全了解自己肩負着改造社會、征服自然、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使命。資產階級右派常是散布狹隘的經濟主義、資本主義思想，來腐蝕工人和工會組織，把工人階級暫時的眼前的利益和長遠利益對立起來，借以模糊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使工人看不到自己肩負的偉大歷史使命和遠大前途，並最終

引导工人运动脱离社会主义方向，走向失败的道路。因此，工会組織必須坚持以从六亿人民出發，从社会主义总任务出發，經常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工人群众，使工人深刻認識自己階級的目前利益和長远利益一致的关系，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一致的关系，提高階級覺悟，坚决抵制各式各样資產階級思想对工人階級的侵蝕。

三、必須提高党内斗争的原則性和警惕性。对于党内一切不利于党，不利于党的團結的言行，必須提高政治覺覺，及时进行坚决的不調和的斗争。必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对于任何陽奉陰違，不服从党的領導和鬧無原則糾紛的現象，必須进行严肃的批判。所有幹部必須努力增强党性，提高共产主义覺悟，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善于識別一切反馬列主义的言行，抵制各式各样資產階級思想影响，並与之坚决划清界限。

中国共产党貴州省委全体委員會議 关于开除康健出党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一致通过)

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省委所召开的全省四級幹部會議上以及这次會議以后，省級机关宣傳、文教系統的黨員幹部和貴陽师范学院的全體黨員揭發了現任省委委員、貴陽师范学院院長康健所犯的严重錯誤。根据揭發和查实的材料，康健所犯的錯誤主要地表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在重大的国际問題上，一貫坚持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立場和修正主义的觀點，对于苏联、对于匈牙利十月反革命暴乱事件、对于中苏关系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进行歪曲

和誹謗性的宣傳。在這種宣傳中，康健完全否定了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先進經驗，否定了蘇聯在保衛和發展全世界的社會主義事業和和平事業中所作的巨大貢獻，歪曲了蘇聯共產黨內的政治生活，誣蔑了蘇聯的外交政策和蘇聯對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正義支援；他把匈牙利十月反革命暴亂事件說成是“匈牙利領導人教條主義地學習蘇聯和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造成的”，說“納吉是對的”，把中國人民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和成就說成是“迷信蘇聯”，把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作了庸俗的和挑撥性的宣傳、解釋。康健在有關國際問題上的宣傳，不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是有損於這些團結。康健的這種宣傳，嚴重地違反了黨的紀律，並且已經在貴陽師範學院的教師和學生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二）在一九五七年的“大放大鳴”和反右派鬥爭中，同情和支持右派的反動言論，鼓動右派集團向党進攻。在“大放大鳴”時，康健對於貴陽師範學院的右派分子張汝舟所寫的“三化”論（旨在丑化黨團員和積極分子）、朱厚錕等在省委宣傳工作會議和師範學院教師座談會上的發言（旨在攻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三反”、“肅反”等運動）、汪陞富所張貼的大字報（旨在誣蔑省委的主要負責同志），對於某些右派分子在文匯報上所提出的“黨委應退出高等學校”、“教授治校”等謬論，都認為“很有道理”，大加讚揚。當貴陽師範學院的反右派鬥爭即將開始、康健已經了解了關於開展反右派鬥爭的精神以後，學生中的右派分子納志良、劉智祥等在該院發起成立“爭取提高教師政治地位與物質待遇發啓委員會”，企圖製造當前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太低”和“遭到冷漠”的輿論，煽動全院的教師和學生、乃至全省和全國的學校教師起來鬧“大民主”，以遂行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對於這一右派集團的陰謀活動，康健不只同情他們的反動言論，而且積極地為

他們出計獻策，支持和贊助他們的行動。在這一反動組織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後，康健都發表了表示同情和支持的談話。在六月三日該院的学生代表會上，右派分子納志良、曾先才等提出要為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物質待遇問題向社會上呼喚，康健當即熱烈鼓掌，並且督促他們趕快通過“呼喚書”；當會議通過“呼喚書”時，康健高舉雙手，鼓掌擁護。在“呼喚書”被通過以後，康健以為書中的反動論據不足，指示右派分子搜集“具體的、有說服力的材料”，加以補充，交由省教育工會（康健為主席）“轉達上去”，並且指示學院辦公室支持經費，要他們把“呼喚書”

“印幾百份發出去”（實際上已向全國各地發出三百份），以擴大社會宣傳。在貴陽師範學院展開反右派鬥爭以後，康健又多方面地為該院的某些右派分子開脫罪責，認為黨員、積極分子“把紅旗插得太高了”；有的右派分子被群眾批判，他就趕忙握手賠罪，竟說“這一個半月來你受驚了”。事實說明，在“大放大鳴”和反右派鬥爭中，康健已經完全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立場，與右派分子同流合污。康健對於“爭取提高教師政治地位與物質待遇發啓委員會”這個右派集團，他不僅是一個積極的支持者和宣傳者，而且是一個實際的參加者。康健的這種叛逆行為，使黨在貴陽師範學院的威信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三）目無組織，抗拒領導，吹噓個人，打擊同志，把貴陽師範學院當作他個人所把持的“獨立王國”。自從一九五二年康健到貴陽師範學院擔任院長以來，他對於省委、省委宣傳部和文教部的領導，始終抱著抵抗的態度，用“頂回去”和“把住大門”的辦法，使省委的某些重要的指示不能在貴陽師範學院得到貫徹。他對於省委所召開的各種會議，常常表示不願參加，認為參加省委的會議，就耽誤了他的教學工作和學習科學。他在省委文教部所召開的會議上，一貫地採取了傲慢和對抗的態度。在貴陽師範學院的黨委會建立以後，即便是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之後，康健仍然堅持在學院工作的領導上執行“一長

制”，許多重大問題不經黨委會的討論，即由個人決定、公布，以排斥黨委會對於學院工作的統一領導和監督。在康健的心目中，黨委會只是他個人的附屬物；他公然向其他高等學校的同志說：“黨委開會，你們同意我的意見了，這就是黨委制；你們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按老法子辦，還是一長制。”在一切場合下，康健總是吹噓自己，極力地在群眾中製造個人崇拜。他竟然決定把他進入學院工作、對該院教師開始進行思想改造的六月十二日定為“院慶日”，以該院的開創者自居；甚至容許並且在群眾中備加贊揚于一九五三年的“院慶日”在該院的壁報上所貼出的他同毛主席在一起的大幅畫象和歌頌他的詩句。康健對於在貴陽師範學院工作的一些較老的黨員幹部，一貫地採取了排斥和打擊的態度，說他們“不懂裝懂”、“已經過時”、“要被淘汰”，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和辦高等學校，說他們在那里工作是給他“背包袱”、“戳窟窿”，對於他們進行諷刺、謾罵和打擊，使他們難於工作，並且想把他們一個一個地趕出去。為了打擊老幹部，他甚至採用了拉攏一批、打擊一批的惡劣手段。對於省委的一些負責同志和省委文教部的負責同志，康健不斷地散布一些流言蜚語；他甚至有意地在黨內製造輿論，企圖搞垮省委文教部的負責同志。康健對待組織、對待同志的惡劣態度，是他的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反映。他的這些錯誤行為，嚴重地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損害了黨的團結。

（四）在實際工作中，一貫地歪曲黨的方針、政策，表現為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在知識分子工作中，康健歪曲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片面地、孤立地強調了團結的一面，而忽視和放棄了教育、改造的一面。在康健看來，知識分子都已經改造好了，不用再改造了。他認為知識分子一向“吃不開”，現在該是“知識分子上台”、“工農幹部下台”的時候了。他認為知識分子“有學問”，再提改造，會傷害他們的自尊心。因此，康健對於知識分子總是百般遷就、無所不從，很少對於他們進行批評和

帮助。他在知識分子的建党工作和幹部工作中，总是只強調業務能力，不問政治品質。他給学生指引的方向，是脫离实际、脫离政治的方向；他办学校所走的道路，实际上就是“教授治校”的道路。在“肃反”工作中，特别是在这一工作的后期，康健完全成为一个投降主义者，說“肃反”完全錯了。康健对于党的各項方針、政策，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並且夸大实际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对于党的各項方針、政策加以歪曲。他总是从反面去看党的文件和報紙，不相信党的号召和指示。对于貴陽师范学院“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党的历次整風运动，他都加以歪曲，否定了这些运动的成就。在这里，充分地暴露了康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場。

根据上述事实，省委全会認為康健的錯誤是極端严重的：他已經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背叛了党的原則，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無产阶级的革命事業，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資產阶级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严肃党的紀律，省委全会決議：撤銷康健的省委委員和他在党內的其他职务，开除康健的党籍；並且建議有关方面撤銷康健的一切行政职务。

省委全会認為，康健在上述一切問題上所持的立場、观点和他的思想作風，都是資產阶级的阶级实質的反映。康健所以墮落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康健出身于惡霸地主家庭，亲自参加过地主剝削，而且長期受了資產阶级的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成为一个資產阶级型的知識分子。在抗日战争以前，当时康健为了維護自己的阶级利益，在政治上进行投机，曾經加入了国民党，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改組派。到了抗日战争暴發和全民救亡运动兴起，他又抱着政治投机的思想，混入了共产党內。据康健自己交代，在他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他对于党是怀疑的，認為党不相信知識分子，是帶了“阶级異己情調”入党的。由此可見，康健在入党时，从自己的出身和历史上帶來了兩個特性：—

是資產階級思想原封未動；一是在政治上進行投機。康健在入黨以後，經歷了二十年的革命鬥爭。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康健不能不暴露他的階級本性，不能不引起黨組織同他的錯誤思想進行嚴重的鬥爭。從歷史上看，康健的最突出的問題，是他的損人利己、欺上壓下的思想作風。為了同他的這種惡劣作風進行鬥爭，在歷次整風、整黨運動中，黨組織都曾以他為重點，對他進行了嚴肅的批判和教育。但是，每當這種時候，康健却總是用假檢討和混過去的办法，拒絕接受黨的教育。而康健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也是一向未變的，只是由於他有時把它用“左”的形式掩護起來，有時把它用馬列主義的詞句偽裝起來，主要的則是用他的投機取巧的兩面手段把它蒙混過去，以致在過去長時期內沒有暴露它的真面目。一直到了中國革命走進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現階段，當國際、國內的牛鬼蛇神一起向革命大舉進攻的時候，康健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和觀點才充分地暴露出來。由此可見，康健是一個原封未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是長期隱蔽在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政治上的投機分子；貴州的黨組織從黨的領導機構中把他揭露出來，是貴州黨在整風運動中的勝利。

省委全會認為全省的黨員，特別是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都應當從康健所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一）康健是一個二十年的黨員，由於他堅持他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拒絕黨的教育、改造，終於走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成為右派分子。這說明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要從思想上得到徹底的改造，從根本上轉變立場，必須經歷長期的和嚴重的階級鬥爭。思想改造要靠黨的教育和群眾的教育，但是最起作用的還是自己的覺悟；黨和群眾的教育，只能通過一個人的自覺，才會發生作用。改造思想，必須採取老實態度，一點也不能作偽；誰要作偽，誰就欺騙了自己。康健入黨二十年，黨對他的教育不能說少，而由於他根本沒有這種覺悟，一貫作虛弄假，他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仍是原封未動，經不起階

級斗争的严重考驗。在我們党内，资产阶级的思想同無产阶级的思想，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要作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必须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剝削制度基本上已經被消灭以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大敌，而资产阶级思想在知識分子中的最突出的表現，則是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在我們党内，有不少同志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对于知識分子出身的党员來說，应当特別警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否則也会走上康健所走的道路。

(二) 我們同康健的錯誤所进行的斗争，是在政治理論战线上的兩条道路的斗争，是保衛馬克思主义和反馬克思主义的斗争。康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总是披了馬克思主义的外衣。現在看来，康健对于国际、国内的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所持的立場和观点，証明他一向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但是長期以来，人們却为他的外衣所迷惑，一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我們經過了反右派斗争，在政治上提高了警惕，才把他从他的外衣里揭露出来。这里說明，我們在政治战线上同反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斗争，必須同时在理論战线上同一切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我們要在政治、理論战线上胜利地开展兩条道路的斗争，就必须紧紧地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我們必須加紧理論学习，提高我們的理論水平，在理論战线上去明辨敌我、是非和真偽。任何修正主义的观点都是反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我們都必须同它們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 从康健的錯誤中說明，一个未經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总是以極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同党的組織原則相对抗：以个人突出同党的集体领导相对抗，以分散主义同党的統一集中相对抗，以自由主义同党的紀律相对抗，甚至以宗派活动、分裂党的組織，同党的团結相对抗。个人同組織相对抗，要求組織服从个人，或者只要个人、不要組織，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本能的表現，其目的在于从組織上制造混乱，削弱組織的作用，以突

現个人的野心。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都是从组织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的重大原则；没有这些重大的组织原则，党就不能有统一和团结，就无所谓党组织，党就失去了一切，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战斗力。正因如此，党的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阴谋从我们党的组织上破坏我们党的事业，而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正是可供敌人利用的基础，这就是说：维护党的组织原则，就是维护党的生命；我们必须同那些违反党的组织原则、违反党的纪律的分子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斗争。

省委全会认为，康健的问题对于全党都有教育意义，决议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传达。康健的错误思想在高等学校中已经产生了影响，省委全会要求各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在党内、党外采取措施，彻底地清除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梁旺贵党籍的决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一致通过)

省委候补委员、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梁旺贵（侗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早在去年七、八月间黔东南州级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和省民族代表座谈会斗争右派分子王天锡时已有揭露，在去年十一月间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黔东南代表团对他的罪行又进行了大量地揭发和系统地批判。经过黔东南州委的详细查对和这次省委全会的充分讨论，已可肯定梁旺贵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揭发的材料说明，梁旺贵已经和冯兴谟（侗族，黔东南自治

州州委委員、州人民委員會秘書長）結成了反黨同盟。他們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作武器，進行破壞黨的團結和民族團結的活動。他們對待苗族黨員幹部，採取了打擊和排斥的態度。他們對待一些擔負領導工作的苗族黨員幹部，經常散布流言蜚語，進行惡意的誹謗。並且，他們在一些侗族黨員幹部中，進行挑撥活動，離開各民族黨員幹部之間的关系。

揭發的材料說明，梁旺貴、馮興謨已經和王天錫右派集團結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同盟。這兩個右派集團的共同罪行，是以建立侗族自治州為名，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裂民族團結的陰謀活動。在這一陰謀活動中，梁旺貴是主要策動者之一。早在一九五四年梁旺貴就背着黨同王天錫勾結在一起。梁旺貴和他的反黨伙伴馮興謨，同王天錫的关系十分密切，無所不談，對黨却不講實話。去年一月，王天錫進行簽名活動時，曾派人通過馮興謨和梁旺貴聯系，王天錫右派集團草擬的所謂申請建州的文件，也是經過馮興謨看過的。這些事實已經充分暴露了梁旺貴的政治面貌。他已經完全墮落成為一個披着民族外衣的右派分子了。

揭發的材料說明，去年五月王天錫右派集團中的張克剛、歐陽淇，在黔东南自治州政協會上肆意向黨進攻的時候，梁旺貴不僅暗中參與、公開鼓勵和支持，還利用自己的職權，從另一方面向黨展開進攻。他積極布置調查材料，派人到農村進行煽動，親自活動新華社記者向中央反映所謂“群眾”建州要求，企圖“以群眾性來壓迫中央”，其反黨活動真是猖狂已極。

揭發的材料說明，去年7月，梁旺貴曾再三阻止對歐陽淇等右派分子的鬥爭。去年十一月，全省四級幹部會議上，開始揭發他的罪行時，他曾威脅馮興謨，阻止暴露他的反黨活動。直到他的反黨罪行全部被揭發出來，才不得不低頭認罪。

另外，揭發的材料還說明，梁旺貴對於本民族富裕農民開糧積極地支持，對民族上層人士撤銷鄉支部書記職務、開除農業社社員的反動行為，不聞不問，失掉了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立場。

梁旺貴成为資產階級右派並不是偶然的。他有極端严重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野心。他有濃厚的狹隘的民族优越感，看不起苗族，甚至連自治州名称把苗族排在前面也表示不滿。他以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觀點看待党。不把党看成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統一的党，而看成是各民族的联合会，对某些党組織沒有本民族領導幹部就極端不滿，以致發展到誹謗省委执行民族政策不公平，發表所謂“对苗族轟轟烈烈，对侗族冷冷淡淡”的謬論，否定党在侗族地区执行民族政策的巨大成績。在建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后，不顧历史發展的现实条件，不顧是否对社会主义有利、对巩固各民族的团結有利，坚持單幹，破坏联合。他还利用某些侗族黨員幹部的狹隘的民族感情，經常散布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毒素，进行挑撥活动，企圖拉攏这些同志失足落水。以致發展到勾結党外右派集团，互相策应，共同进行分裂民族团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活动。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別的，正是为了實現他的个人野心，即为了建立以他为首的資產階級的“独立王国”。極端严重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野心，就是梁旺貴墮落成为資產階級右派的思想根源。

打着民族旗幟，进行分裂民族团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活动，是一切民族中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其实他們並不是民族的真正代表者，他們实际上是代表那些已經被消灭或正在被消灭的剝削階級，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胜利的形势下进行的掙扎和反抗。梁旺貴出身于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因为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所以在这一場尖銳的斗争中墮落成为右派。这就是梁旺貴墮落成为右派的階級根源和历史环境。

全会高兴地指出，黔东南自治州的党組織是团結的，黔东南自治州各民族的幹部也是团結的，所以梁旺貴的反党陰謀並未得逞。但是梁旺貴的反党活动已經給黔东南自治州的党組織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危害。为此，对梁旺貴的罪行必須进行充分揭發和批判。这对于加强黔东南自治州党組織的团結和民族团結是十分重

要的。

全会一致指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省几年来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侗族地区並不例外。梁旺貴誹謗党执行民族政策不公平，否定民族工作成绩，是毫無根据的。至于說对“侗族冷冷淡淡”，这是和右派分子王天錫的“大汉族主义使侗族四分五裂”的謬論一脈相通的。同时一致指出，我省历史發展状况的特点是各民族杂居，所以有大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民族联合社，有許多机关、工厂、学校都是各民族工人、学生、教师、幹部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各自治州、自治县也都是各民族杂居的。因此，强调各民族之間团结互助，对于我省社会主义建設有特別重大的意义。那种不願联合只願單幹的民族分裂主义傾向是極端有害的。

为了巩固党的团结，純潔党的組織，加强民族团结，全会决定：开除梁旺貴的党籍，撤銷其省委候補委員、州委書記处書記，一切党内职务。並在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区的党組織内进行傳達，接受經驗教訓，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

全党应当从对梁旺貴的斗争中吸取什么教訓呢？

一、维护民族团结，把各民族团结在祖国的大家庭之内，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業而共同奋斗，这是各民族的基本任务。而民族中的资产階級右派，总是披着民族外衣，以维护本民族利益面貌出現，进行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因此，必須提高警惕，注意资产階級右派进行分裂民族团结的陰謀活动，一經發覺，就应当毫不容情地加以揭發和斗争。

二、民族中的资产階級右派在进行分裂民族团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活动时，总是以地方民族主义作为武器的。事实証明，地方民族主义有了新的滋長，並且已經成为一种危險傾向。因此，必須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首先要在下列几个問題上，与地方民族主义划清界限。1、不能把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对立起来，应当把民族自治区域作为社会主义

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自治的目的，从根本上說来，是为了团结各民族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披着民族外衣的右派——地方民族主义者，为自治而自治，实际上是要建立“独立王国”，借口“当家作主”，不要党的领导。2、不能片面强调照顾民族特点。不管这些特点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否有利，对各民族的团结是否有利，对于本民族的发展是否有利，一律都要强调照顾，是没有好处的。其实民族特点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好的发扬，不好的抛弃，这对于各民族的发展只有好处。社会主义的胜利，必然将各民族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民族。同时，各民族之间，也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谁的长处学得多，谁的进步就快。把民族特点看成铁板一块，而片面强调照顾，就阻碍了民族的进步。地方民族主义者，正是利用这一民族偏见，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当然，各民族特点的应兴应革，是各民族自己的事情，绝不可强加于人。3、在民族关系上，不愿联合，只愿单干，是错误的。这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右派正是利用这一种错误心理来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的。必须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的斗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地方民族主义者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一部分。我们各民族干部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各个民族成份的党员和干部都应该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应该被民族主义的毒菌所沾污。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不彻底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迟早就会走上梁旺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个人主义思想与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常常纠缠在一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不论是那一个民族成份，都必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力求共产主义化，把自己锻炼成为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不能只指望以一个民族身份向党要特殊待遇。我省各民族成份的党员，一般党龄都比较短，共产主义教育还很不够，更必须虚心学习，与汉族党员干部一样，订出计

划，認真改造自己。

四、加强組織性和紀律性，反对任何破坏党的团結統一的活动。对于違犯党紀国法的黨員，不論那一个民族成份，都必須按党章国法处理，不能有任何迁就。否則，对党和黨員都是沒有好处的。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 第二次會議关于开除叛党分子

刘建的党籍的决定

(1957年12月19日全体通过)

前中共山东省委委員、大众日报总編輯刘建，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后，即散布他的資产階級办報綱領，至大鳴大放期間，完全走上了背叛党的道路，变成一个徹头徹尾的党内極右分子，並抗拒改造，叛党自杀。他的主要反党罪行如下：

一、刘建企圖用資产階級的办報綱領，篡改大众日报的政治方向和党报性質。他經常以自己的所謂“群众性”反对报纸的党性，他所指的群众实际上是資产階級的知識分子、小資产階級、小市民等。他主張报纸不登或少登省委和省人委的指示以及党的生活的宣傳报道，把上級机关的指示看成是不代表“群众”利益的。他主張庸俗的兴趣第一，經常強調所謂“兴趣性”，以圖取消报纸的階級性和报纸对工作的指导作用，想用办所謂“群众”报对抗党委的机关报。他对揭露我們新社会的“黑暗面”兴趣極濃，要党报工作人員全面地揭露社会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並以此作为“思想活潑”的标准。同时煽动編輯部人員要說中央、

省委沒有說过的話，他認為說中央、省委說过的話，就是教条主义。他借口報紙是群众的“喉舌”是“輿論机关”，要适应讀者的“兴趣”和“爱好”，如不改变党报性質，就会引起各方面的矛盾等，公然提出：要省委摆脱与報紙的关系，要“从根本上改造報紙”，“实行報紙革命”，要求省委另办一張供幹部看的報紙，而把大众日报变成“群众”报，也就是完全脱离党的领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刊物。

二、为了突現他的反动的办报綱領，在組織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有一套完整的“組織路綫”。如主張聘請“老报人”（即在国民党和敌伪时期办过报的人）当報紙“顧問”，由他們来修改重要文章和处理标题。为了“改革”報紙，在刘建直接指示与主持下在报社内部所組成的“报改小組”有半数是右派分子，“报改小組”的成員用了很長時間，大量地搜集和閱讀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聞書籍，进行制訂报改方案。他反对党的德才兼备的幹部政策，主張“文人办报”，对某些未經很好改造的資产階級知識分子未被提拔到領導崗位上来表示不滿，他認為这就是“宗派主义”。对某些老幹部在文字水平上的缺陷，則極力加以夸大，企圖將他們排挤出去。積極倡导資产階級“报人”的領導方法和办报方法。甚至認為当省委委員同时办报不方便，必須解除他的总編輯以外的一切职务（主要是摆脱省委委員）才能把報紙办好。

三、刘建从他的資产階級的办报觀點和立場出發，極力反对党对報紙的領導，經常抵抗、攻击、誣蔑省委，並同党委对立。自去年冬季以来，屢次抗拒登載省委和省人委的指示、报告等。如：省委关于农村工作的补充指示，他表示不同意登載；去年冬季进行基層选举时，省委指示大众日报要随同轉載人民日报有关社論和国务院的通知，以及省人委負責同志关于“保証做好基層选举工作”的报告，他兩次打电话加以拒絕；省委傳達二中全会的決議的會議，他認為沒有“新”內容，不准备登报，經省委指

責后他才勉强用了新华社稿。今年二月省委负责同志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大众日报“强调群众性，忽视党性”的错误，刘建却在背后诽谤省委，煽动报社同志对省委的不满。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更加狂妄地说：省委错了，他对了；省委是外行，他是内行。利用各种场合放火，向省委进攻。

与此同时，他对新闻界中的右派分子王中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并避开省委让王中给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作报告，随后又组织专门的座谈讨论。对于王中在报社散布“报纸不能指导工作”、“兴趣性”、“机关报受约束”等反动论点及辱骂党报是“寡妇脸”、“铁青面孔”、“板着面孔教训人”等反动言论则极力加以宣扬。刘建与王中密谈时，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诬蔑省委。

以上事实完全证明了：刘建是有严重的反党罪行的极右分子，正如他在“绝命书”中自己承认的：“我是山东党内最大的极右分子”、“我的反党罪行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竟至反起党中央来了”。省委发觉刘建错误后，曾数次找他谈话，耐心地对其进行教育，让他主动检讨和交代，但刘建没有这样作，而在其“绝命书”中说：党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然而他由于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知罪孽深重，不愿彻底检讨交代，拒绝党的教育，拒绝改造自己，最后采用了可耻的自杀手段，完全走上了叛党的道路。因此，经省委十一月十二日会议决定和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开除叛党分子刘建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国共产党监察部党组关于右派分子

王翰的处理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王翰，原名陈延庆，男，四十六岁，江苏省鹽城县梁垛乡人（現划归建湖县），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春由于上海南市的組織破坏，动搖脫党回家，一九三四年春在上海复旦大学恢复关系。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秘書長，中共鄂西北区党委書記，新四軍第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城工部組長，中南人民監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前政务院人民監察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書記，監察部副部長（七級）、党组副書記，中共中央監察委员会候补委員，“八大”代表。

王翰是監察部右派反党集团首領，極右分子，他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如下：

一、經常散布反党反馬列主义的謬論，散布取消階級斗争的觀點。他說三大改造以后，过渡时期就結束了。意思就是階級斗争就息灭了。他詆毀党所領導的历次政治运动，說“每次运动开始都是反右，以后反左，最后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他指責土改时对地主斗争过火，主張温和一些。他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說，以反对唯成份論为借口，在發展党员时，要吸收所謂有文化有才能的知識分子，並把一些政治历史未考查清楚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他反对党内思想斗争，誣蔑列宁对托洛茨基等叛徒只講团结，沒有斗争，誣蔑刘少奇同志的“論党内斗争”是“論党内妥协”。他造謠說“馬克思規定的一些原則是为了給別人遵守

的，馬克思自己並不遵守”，“馬克思只會寫文章，不懂得什麼科學”。他還誣蔑“毛主席‘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並散布毛主席這一報告中有“修正主義”。

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宣傳社會主義制度有陰暗面的荒謬觀點。他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說“國務院所屬各部門的工作是一場糊塗，經不起檢查”；攻擊我國發展國民經濟計劃不是“冒進”就是“冒退”；認為現在的大學教育和建築工程都不如解放以前；對黃紹竑的反社會主義言論十分贊賞，到處替黃紹竑吹噓。他為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經常在幹部中宣揚資本主義的廠礦企業經營管理完善和產品優美，美國的托拉斯形式好，他認為蘇聯改變工業體制，是學習美國的托拉斯形式。他堅持要用美國資產階級學者杜威的“圖書十進分類法”來整理監察機關的檔案，反對國家檔案局關於整理國家機關檔案的規定。

三、王翰在監察工作的重大問題上，反對中央和監察部黨組的指示和決議，企圖貫徹他的反黨主張。他認為監察機關與其他業務部門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他堅持監察機關的任務應該是經常地、系統地、前後腳接地檢查生產、經濟、財務活動，不僅要全面地檢查國家計劃、財務預算的執行和總結，而且要檢查國家計劃、財務預算的制定。說只有這樣作，才能抓住“有頭等意義的大問題，打中要害”。主張“要多搞些頭頭”，才能解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問題，企圖把矛頭指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他反對監察機關檢查案件及處理公民控訴工作，說這些工作是“雞毛蒜皮，意義不大”。甚至主張對嚴重違法亂紀分子要“愛人以德”。在監察工作的作法上，他堅決主張“事先監督”，反對中央關於事後檢查的指示；堅持監察機關要保留對財經部門行使停止支付權力；反對監察機關依靠各級黨政領導進行工作；誣蔑黨的群眾路線是“抽象的”，監察機關走群眾路線不解決問題。在

體制問題上，他堅持要搞垂直領導，堅持要有管理各級監察幹部的權限；反對中央關於監察部門體制改為雙重領導的決定。王翰還一貫以學習業務為幌子，反對加強監察機關的政治思想領導，反對監察幹部訓練班教政治課，說什麼“業務就是政治，沒有業務那有政治”。

四、王翰為了實現他的一套反黨主張，在監察部工作中和右派分子彭達、陳達之等勾結起來，形成以他為首的反黨集團。他在工作中採取陽奉陰違的兩面手法，對中央和黨組的指示和決議，當面同意，背後反對，經常和黨組鬧對立，並多次乘黨組多數成員不在時，擅自改變黨組決定。第六次全國監察工作會議前後，王翰竟策動他的反黨集團分子彭達等大肆活動，反對中央關於監察機關實行雙重領導的決定和第六次全國監察工作會議的決議。這一陰謀未能得逞，他們就在部內外散布流言蜚語，誣蔑第六次全國監察工作會議沒有解決問題。

王翰還和他的反黨集團分子互相吹捧，經常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破壞黨組威信。他們誣蔑黨組成員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不懂業務”，“沒有常識”，揚言“黨組成員中唯有王翰熟悉業務，監察部離開王翰不行”，暗示王翰應該當監察部長，甚至吹噓王翰應該選為中央委員。

王翰還在幹部中拉攏一些人，打擊一些人，培植親信，封官許願，企圖擴大他的反黨集團，並企圖以整調機構和領導分工來控制監察部的全盤工作。

五、在日常工作中，王翰一貫目無組織，獨斷專行。他決定的許多重大問題，既不向黨組請示報告，也不傾聽下面的意見。當他的反黨主張受到抵制或別人的意見不合他的心意時，他就利用各種機會，發牢騷，散布不滿情緒，或者刁難打擊、辱罵訓斥幹部。甚至故意製造混亂，撥弄是非，他常常在公文上胡寫亂划，挖苦諷刺，寫些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批語。或者答非所問、張冠李戴。他經常用詭辯的方法來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為

他的反党活动进行辩护。如他为了坚持“事先监督”，就說“事先就是事后，事先事后沒有绝对区别”。为了坚持实行垂直领导，就說“双重、垂直各有利弊，双重好，还是垂直好，很难說”。他还散布“越抽象就越具体，越具体就越抽象”、“什么都不管，也就什么都管了”、“不解决问题，问题也就解决了”等謬論，以此在幹部中制造混乱。

王翰腐朽的资产階級思想，也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上。他在生活上極力地追求享受，严重地鋪張浪費。

六、整風开始，王翰积极煽風点火，篡改党組的整風計劃，大肆向党进攻，企圖利用整風，搞垮党組，夺取監察部的领导权，以便实现他的一套反党主張。反右派斗争开始，王翰抱着抗拒态度，邓小平同志传达中央的报告他不听，部里召开的各种反右派斗争會議也極少参加，並积极为党内几个右派分子辩护。当二司批判彭达的反社会主义言論时，王翰千方百计地加以包庇。当部整風领导小组确定彭达为右派分子后，王翰立即向彭达通风报信，並訂立攻守同盟。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党組扩大會議討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布置本部反右派斗争的部署时，王翰竟憤然离开会场，公开宣布以后不参加党組會議，当晚又給党組写信，进行威胁。

七、王翰反党反领导是由来已久的。他在上海作地下党工作时，即曾反对过区委的领导同志。一九三九年他在担任鄂西北区党委書記期間，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鄂西北准备游击战争，支援鄂中游击战争的指示；又違反党的秘密工作原則，进行党员登記，並把在李宗仁军队工作的許多党员高級幹部也进行登記，后来把这些党员登記表連同中央的絕密文件一起失落到国民党特务手中，事后不按照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同志的建議組織幹部撤退，結果使鄂西北党的組織遭到严重破坏，造成重大損失。他在新四軍第五师政治部任副主任时，一直主張和強調军队政治工作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不服从鄂豫区党委的领导，並千

方百計的打击工农老干部，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他在中央城工部工作期間，也对领导不滿，背地进行誹謗，並誣蔑組織“不把人当人”。一九五一年王翰調到中南監察委員會工作以后，強調国家監察工作的独立性，公开反对前政务院关于各級監委应受同級政法委員會指導的指示，不出席中南政法委員會黨組會議。他認為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工作檢查不得，尽是毛病，与他們無法共事，誣蔑李先念同志“無能”，任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不称职，並造謠說中央对李先念同志不信任，才叫李雪峰同志兼任一个副主席。他还把中南行政委員會和中南監委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当成是“要人、要錢、要編制的关系”。

王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其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王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長期受到資產階級的教育。他虽然早就参加了党，但始終对党不忠誠。入党不久，又一度动摇脫党。他一貫追求个人权位，狂妄自大，不服从党的领导，拒絕党的教育和同志們的批評，拒絕进行自我改造。这些情况說明，王翰是一个混入党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他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

几个月以来，王翰对自己的反党罪行不老實檢討交代，曾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經過多次大小會議斗争以后，才表示低头認罪，写了九份“檢討”和“交代”，但对他的許多严重罪行，仍避重就輕，进行狡辯，企圖蒙混过关。

根据王翰的上述罪行和斗争中的表現，决定开除其党籍，行政上撤銷其一切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原有待遇。

中国共产党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党組

关于右派分子謝雪紅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

一、簡历

謝雪紅，女，57岁（一九〇一年生），汉族，台灣省彰化人。家庭出身搬运工人。本人成份是商人。

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香港重新入党。

謝雪紅家庭貧苦，幼时被卖为童养媳，長大后嫁与地主兼包工头張树敏为妾，随張到大陆来，在杭州参加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八月，由黃中美（后叛变，任蔣經国秘書）介紹入党。同年十月，党派她到苏联学习，在东方大学日本班学习兩年。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成立台灣共产党，即日本共产党台灣民族支部。謝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員。不久，謝在上海被捕，解往台灣，关了几个月，出獄后經營国际書店，她屡次抗拒共产国际东方局关于台共犯了右傾机会主义路綫錯誤的批評，在組織上鬧宗派主义，排除異己，直到剩下几个亲信。一九三一年六月再度被捕，起初表現尚好，但后公开声明“轉向”（即自首变节）反对共产国际的綱領，主張在日本天皇制度下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号召日本中国朝鮮台灣無产階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美国。据楊春松同志揭發，謝还在獄中出卖同志：指証楊春松同志为台共黨員。謝一直隱瞞这段历史（這個問題尚無旁証）。

謝被判徒刑十三年，但刑期未滿，一九三九年四月便以“停止执行”名义被釋放出来。出獄后，謝与日本特务高倉喜滿造往

来密切，同时与楊克煌在台中合股經營洋貨店“三美堂”。在日本进行侵略中国战争期間，“三美堂”为日兵服务特別亲切，被称为“兵之家”。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謝在台中經營大华酒家，参加組織“人民协会”，进行政治活动。一九四六年一月，由陈立夫、李翼中（国民党台灣省党部主任）介紹参加国民党为特別党员，曾任国民党台灣省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員，台灣妇女会理事等职。

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起义中，謝在台中参加起义，当人民要求槍斃有血債的伪台中县长刘存忠时，謝千方百计加以包庇（最近刘存忠向大陆广播，感謝謝雪紅救命之恩）。在敌人反攻台中以前，謝携走公款台幣十万元，与楊克煌逃往埔里。敌人进攻埔里，人民武装部队主动出击，回来时又找不到謝雪紅。謝与楊又逃跑了，逃到竹山，便写信給蔣經国（当时报載蔣經国要去鎮压二二八事件），說她是蔣經国的同学，是国民党員；說二二八起义是反对陈仪，不是反对国民党；要求蔣經国“寬大处理”。在政治上背棄人民起义，向蔣經国求饒。

一九四七年五月离开台灣。同年十一月，在党领导下，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謝任主席。一九四九年謝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政协全国委員，全国妇联执委，民主青联副主席，华东軍政委员会委員等职。在党内，謝任华东局台灣工作委员会第二副書記，一九五一年八月因犯有严重錯誤被停止职务，参加整風、整党。

一九五五年二月，台盟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謝亦来京。在处理右派以前，謝任台盟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員，全国紅十字会理事；在党内，是中共台盟党組成員之一。

二、主要反动言行

（一）在台灣問題上，有一套反动的理論和政治綱領。

謝雪紅主張台灣“自治”，“高度自治”，“台人治台”。這種主張，實際上是要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王國。她和楊克煌都說：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是一個“獨立民族”。事實上，台灣人除少數高山族以外，都是漢族人民，絕不是一個獨立民族。謝又強調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大陸有不同的特征，台灣人与大陸人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特殊的政治要求。根據上述理論，即獨立民族和台灣特殊的理論，她堅持要求台灣“自治”，說“自治是台灣人民几十年來的要求，反對自治就是台灣人民和台灣歷史的罪人”（鬥爭會上說的）。

她的所謂“自治”是要求“省、縣、市長，都要選舉台灣人”（在黨組會上說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台盟華北總支部成立會上，謝叫人代讀一個文件，說台盟還要掌握“武器鬥爭”，台灣要在北京設立一個機構，“與各國通商”。她還組織了一個文化企業公司，在籌備會上，她答應這個公司將來可以回台灣接收文化企業。顯然的，她的所謂“自治”實際上就是台灣獨立。

謝為自己辯護，說她講自治是講歷史，不是政治主張。事實不是如此。一九五六年十月，中共中央關於紀念中國政府在台灣受降十周年的指示中提到，在宣傳上應反對所謂“自治”。當李純青同志向她傳達時，她即表示反對。她還說“如果今天反對自治，在大陸上的台灣人也會覺得奇怪”，她在紀念會上竟避而不提反對自治。一九四七年五月，她在沈陽還向盟員黃啓章等人宣傳自治主張。在鬥爭會上，她還說不能打擊現在在台灣的人要求自治，這種打擊“是殘酷的”。她並且悍然宣布：台灣民主自治台盟名稱不能改，“自治”兩字不能取消。

台灣人不是少數民族，姑不論主張自治是否即主張獨立，主張台灣自治就是違背憲法第三條及第四節第五節各條的規定。

（二）陰謀以台盟對抗黨和代替黨，反對黨對台盟的領導和管台灣的事。

謝說“台盟是台灣各階層人民統一戰綫的核心”。在台盟華北總支部成立會上的文件中說，台盟在北京應負起下面的任務：

“向中央政府提供資料，作建議、要求，應其諮問，作各種交涉等，以及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聯繫，進一步與各國政府的通商等”。即在理論上，台盟在台灣要代替共產黨的地位，為台灣各階層人民的核心；其具體任務是“代表台民利益”，作為向中央政府的“交涉”團體，並且要“與各國通商”。

在黨組會上，謝說：“台灣對共產黨沒有好感，對台盟有好感”。又說：“美國在台灣的主要敵人不是共產黨，而是台盟”。

（三）依靠反革命分子、漢奸、不法資本家及各種壞分子，作為台盟的領導骨幹，並蒙蔽拉攏中間分子。

謝雪紅在總部過去依靠反革命分子李上根、王思翔，這兩人大權在握，掌握台盟公章，看絕密文件，事無大小皆與共謀。在北京，依靠漢奸楊克培、郭良，不法資本家林鏗生。林鏗生因嚴重違法被捕，出獄後，謝就支持並幫助他翻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謝竟私派林鏗生代表台盟出席全國工商聯會議。林非盟員亦非台盟機關幹部，謝說，“我是主席”，“我也是黨”，我要派誰就派誰。在上海，謝依靠反革命分子林政漢。一九五一年謝曾支持林政漢陷害在林工廠內的七名工人為反革命分子。林政漢被捕後，謝一直為他呼冤，一九五六年夏天還向最高檢察院提出此案。在廣州，謝依靠右派分子黃光衛，還為不法資本家丘晨波進行翻案。一九五六年五月和年底，謝兩度到廣州視察，都向省委統戰部提出丘案，認為處理不當，應予糾正。

一九五六年黨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以後，謝認為時機已到，便利用視察機會到上海、南京、武漢、福建、廣州等地找她的親信積極活動，未經台盟總部討論即向當地統戰部提出了一批主委、副主委名單，企圖一手包辦台盟各地人事安排，擴大她的個人勢力。

謝對中間分子和不明真象的人不惜用各種手段進行蒙蔽拉攏，她到處封官許願，送錢送禮並經常津貼一些人，用同鄉感情，用於兒干女，台盟主席繼承人，甚至用包辦入黨入團作為培養個人勢力的手段。

（四）對我黨過渡時期的許多基本政策採取敵對態度。

在肅反問題上。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政協視察工作座談會上，謝提出一批案件，為反革命分子陳昌岱等人呼冤。她同情胡風反革命集團，對人說：“胡風這些文人能搞什麼，不過對現狀不滿發發牢騷而已。”謝為胡風分子王思翔說話，“王和革命有血肉關係，是被人陷害。”甚至為王思翔哭泣和失眠。一九五一年鎮反時，謝雪紅和楊克煌寫信給台盟華北總支部，阻撓在台盟機關幹部中進行鎮反運動。

喪失民族立場，包庇漢奸。一九五〇年六月，謝向政協全國委員會提出一個建議案，污蔑偉大的抗日戰爭為“中日兩國處於交戰狀態”，“此種敵對行為應由日本國家及發動戰爭之國家（指中國）主要官吏負責”，“敵國人民（指台灣人民）不負戰爭責任”，台灣沒有漢奸，因此她建議：“請政府明令宣布保障台灣人民生命財產”。與此同時，她為文化漢奸柯政和請求發還被沒收的財產；在上海，為台灣買辦資本家林勤奔走幾個月，企圖從國家手中取回已被接管的大批房產。

對三反五反一直不滿，一直為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依法處理的不法資本家林鏗生、丘晨波等人進行翻案。

在思想改造問題上，她曾阻撓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文化漢奸江文也在報上發表檢討文章，並攻擊音院黨組織說：“黨委為什麼不能對你負責，讓你發表文章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謝曾替惡霸地主呼冤。江宏俊之父為惡霸地主，在土改中被鬥自殺，江宏俊寫了“訴狀”，謝替他轉給華東土改委員會，支持江控告農民。

（五）反抗黨的領導，破壞黨的團結，誣告黨員同志為反革

命分子。

一九五〇年四月，謝支持反动分子企圖推翻上海台灣同鄉會的黨的領導權，公然進行反黨活動。華東局組織部長劉曉不同意她對同鄉會問題的意見，她在背後威脅說：“要自殺給劉曉看。”一九五一年，謝沒有當上全國婦聯執行委員，就在支部大會上大罵華東婦聯黨組，並通過楊克煌二次向中央控告。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謝沒有當上全國政協委員，她在台盟黨組會上攻擊中央統戰部安排台盟政協委員“都是台灣人民有仇恨的人”。在黨的會議上，稱我黨為“領導黨”。

一九五六年，謝向中央要求拜見當時來京的日共志賀義雄，說要向志賀彙報台共情況。中央不同意。謝竟將此事告訴非黨群眾右派分子沈毅，表示不滿。

謝在台盟總部叫群眾非法監視台盟中的黨員李純青、陳炳基、馬再光等人的行動，收買東單區公安局壞分子楊錫琨（最近已逮捕）調查黨員行動，搜集控告材料，並造謠說“陳炳基要殺謝雪紅”。

謝經常將黨內文件給沈毅看，曾經將第九兵團準備在台灣登陸的絕密材料及敵情材料給反革命分子李上根看。通過楊錫琨，叫沈毅寫報告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控告黨員陳炳基等人。謝在沈的控告中加註：1.此事不要給李純青知道。2.控告書不要轉交統戰部。

據沈毅揭露，謝叫她抄寫材料誣告黨員和非黨人士十八名。黨員李純青、陳炳基、徐萌山、王錫珍、王天強、謝雪堂、吳克泰、李喬松、林良材等均被誣告為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嫌疑。中央公安部為對外機關，謝向中央公安部告反革命案三十餘件，其中被誣告的有許多是黨員同志。

（六）大鳴大放期間，用各種方式點火，向黨進攻。

謝在幕後主使台盟幹部沈毅攻擊黨的幹部政策有“宗派主義”，“只照顧黨員”；丑化在台盟工作的黨員，攻擊台盟工作

是“黨員包而不辦，幾年來沒有什麼成績”。攻擊統戰政策是“統進步不統落后”，“寧左勿右”，誣蔑中央統戰部“偏听偏信”。在沈毅放火以後，謝對沈說“中央統戰部有兩個意見，叫沈去中央統戰部替她‘摸底’。”

謝還煽動幹部用寫大字報，向報社投稿等辦法，企圖趕走台盟的共產黨員。

謝挑撥高山族和黨的關係，對賈藤武說：你們多來幾個人，參加台盟整風，好好地整他們（指台盟黨員）。“他們不關心高山族，只有我是關心高山族”。

謝通過沈毅向盟員右派分子江文也點火。江在台盟北京市支部鳴放會上說：“共產黨歧視台灣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中國人。”“台灣解放後，不要再來個二·二八事變”。又說：“東京有個廖文毅，台灣有個蔣介石，大陸有個謝主席，這是國際問題，統戰部為什麼不重視謝主席？”

謝向盟員右派分子王象（由濟南來京）點火，王在台盟北京市支部大肆污蔑三反運動，反對台盟整理組織，要求重用謝雪紅的亲信右派分子楊克煌，並且攻擊黨說：“中央統戰部搗亂台盟，要搞垮台盟”。會後，謝對台盟幹部林建文稱讚王象的發言說：“王象說的都是事實，是心裏話，這話不听听什麼話”。

謝還向天津盟員張午亭點火，叫張到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責問：“為什麼天津台盟要改為小組，為什麼不能作市級機構活動？”還為張壯胆說：“你就說是謝主席叫我来問的，不要緊，有事我負責”。而天津台盟改組的事，謝是知道的。改組前，天津台盟盟員成份很複雜，連老牌國際間諜日本人谷立正也被吸收為盟員。

謝到廣州向右派分子劉剛點火，說：“胆子大一些，你的任務重大”。她叫劉向黨進攻，劉在鳴放期間就猖狂地向黨進攻。

（七）積極阻撓和破壞反右派鬥爭。

一九五七年七月，在全國人代會開會期間，暗示陳汝棠代

表不要揭發章伯鈞，說：“不要落井下石，不要指名批判，放放空砲好了。”

当台盟开始反右派斗争时，謝制造空气說：“台盟沒有右派。整風是要搞高級知識分子。”

当台盟斗争右派分子江文也时，謝叫沈把会议情况记录下来，向她彙报。江文也揭露了沈毅点火活动，群众要沈交代私房話，謝惡毒地教沈說：“你可以問什么叫私房說，你是沒有丈夫的人，为什么侮辱你？”又說：“反正撕破臉皮了，你就說是陈炳基叫你去点火好了”。

当台盟斗争右派分子沈毅时，謝教沈要象踩不死的野花一样頑抗到底，还向沈送錢送礼，秘密对沈指示机宜。

(八) 狂妄的个人野心。

謝的心腹楊克煌、王思翔等人写过几本書和許多文章，把謝雪紅描繪为一个偉大的人物，吹嘘她是“老革命”，二二八“女英雄”。而謝則把这些書到处分送。在斗争会上，她說推銷楊克煌的書是党給她的任务。文字宣傳嫌不够，謝还要江文也等人为她的“英雄傳記”写歌剧和話剧。国内宣傳嫌不够，在香港时，她把自己的自傳和照片分寄美英日及东南亞各国，广向資本主义国家作自我宣傳。謝叫盟員甘瑩写文章，称她为“台灣人的媽媽”。在台盟华北总支部成立会的文件(楊克煌起草，用謝雪紅名义發表)上，自称为“我們偉大的領袖謝主席”。她的亲信还在会上动員群众向謝“致敬”，高喊“偉大的台灣人民領袖謝主席万岁！”在这次批判会上有人对此提出責問，謝竟回答說：“对我喊万岁是需要的，自然的”。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謝准备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她印了一百多張照片，打算沿途分送。后来出国未成，她对入埋怨說：“很可惜，差一点兒我就成了著名的国际人物了”。

謝雪紅的野心就是要做台灣“女皇帝”。为了滿足这个野心，她主張台灣“自治”，“台人治台”，实际即要台灣独立。

她把台盟当作达到自己野心的工具，以台盟代替党。因此，她坚决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罪恶活动。

三、斗争中的态度

台盟总部整风领导小组召集各地方组织代表和在京盟员在北京批判谢雪红，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到十二月八日，举行大会十五次，小会五次，共二十次会议。开会时间约一百小时（预备会议不算），谢发言为自己辩护达二十几小时。

谢的态度十分恶劣，不断对群众进行侮辱和威胁，问发言的人姓甚名谁，指名叫骂，说批评她的人将有“后果”（报复之意），拍桌子，瞪眼睛，打茶盅，一再向会议提出抗议。

她不承认事实，在人证物证俱在面前，仍然是一概否认，她说：“我撒谎，你们也得听”。她蛮不讲理，她认为她一点也没有错误，只有太相信沈毅是一个错误（因为沈毅起义，大胆地揭露谢的罪状）。她说：“我就是疯狗，我要咬人”。你们要我承认错误，“办不到，办不到”。

第二次大会以后，她就逃跑不来，说：“随你们怎样处分，我都不来”。中央统战部批评了她，才继续参加会议。群众问她为什么逃跑，她说：“我是一个党员，不能受侮辱，我逃跑是为了爱护党”。执行主席重新宣布：“不管谢雪红是一个党员，党员犯了错误，同样要检讨认错，和非党群众一视同仁。”要求在座共产党员表示态度。在座共产党员都站起来，表示拥护党的政策。只有谢雪红坐着不动，表示反对。

当杨春松同志揭发她出卖同志的历史时，谢竟骂杨会绝子绝孙。江文也批评她，她骂江将不得好死。沈毅揭露她，她骂沈没有良心。

最后一次会，谢不但不承认有任何错误，并且公然反扑说：“全场的人，全体盟员，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斗争结束后，谢造谣说这次斗争是台盟反动派要夺取她的领

導權。她對周華說，“她要活到台灣解放以後，再作清算。”

四、結論

謝雪紅成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

她雖然在年青時參加革命，並受到黨的培養，但在一九三四年已經自首變節，做了叛徒。她出獄後，即墮落為商人，並與日本特務往來密切。日本投降後，她加入國民黨為特別黨員，作各種政治投機，極力向上爬。她的政治關係是複雜的，她的政治生活的歷史很多是骯髒的。

謝雖然出身於貧苦家庭，受過舊社會的壓迫，有其反抗性的一面，但在她的幾十年的生命中，做地主婦，經營書店，做洋貨店和酒家的老板，很大部分時間過着資產階級的生活，習慣於投機取巧，買空賣空。她的身份和思想，都是屬於階級異己分子的。

謝雪紅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政治野心很大。在台共時代，她就以一個獨立黨的唯一領袖自居了。日本投降以後，她在台灣就反對地下黨的領導。她認為她始終正確，只有她才是“台灣革命”的領袖。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起義，給她一個投機的機會，回大陸來就背着二二八英雄的招牌。在香港組織台盟，她擔任主席職務，她認為這是她一貫正確的勝利。回國參加人民政協以後，她的野心就大為膨脹了。她以一個黨（台盟）的黨魁身份，“代表台灣人”的利益，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她以黨魁來向党要價，來對抗黨。她“代表台灣人”，利用台灣人來向國家要價，來對抗祖國，實際即分離祖國。她狂妄自大，唯我獨尊。

謝雪紅這種野心，反映了台灣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的思想。台灣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是對帝國主義妥協的，現在是和蔣介石合作的。雖然所謂台灣“地方實力派”和美蔣也有矛盾，但是他們根本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他們的代表之一廖文毅，就主張台灣人是一個民族，應該獨立。在美國豢養下，廖文

毅在東京組織所謂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總統。謝雪紅是台灣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在我們黨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的代理人。

在目前解放台灣的鬥爭中，謝雪紅的政治主張，例如台灣人是一個“獨立民族”，台灣應該“自治”，台灣有特殊性等，完全有利於美國帝國主義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在客觀上，那就是不要台灣解放，不要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在這點上，謝雪紅又是在我黨和我國內部的帝國主義的代言人。

就謝雪紅整個歷史來看，她並沒有過好民主革命關，她投降過日本帝國主義，參加過國民黨，在二·二八起義中又寫信給蔣經國要求寬大處理，在華東土改中，又表現立場不穩，謝雪紅對民主革命的三大敵人——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都作過投降或妥協。謝雪紅混過了民主革命關，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就混不過去了。社會主義革命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而謝的立場卻站在資產階級那一邊。她支持資本家、又是反革命分子的林政漢陷害七名工人為反革命分子。僅舉這個例已足夠證明謝的立場站在那裡。社會主義革命，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謝雪紅卻反對這種改造，她誣蔑三反五反運動，不斷為不法資本家進行翻案。謝雪紅和國內其他右派分子一起反對黨的肅反政策，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和發展，她也是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就完全是一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她從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企圖建立資本主義的台灣王國，使台灣離開祖國，離開社會主義。

黨對謝雪紅做過長期的教育工作，從一九五一年起，就對她進行批評和幫助，指出她的錯誤，提出警告，並採取過一些措施，耐心等待她的覺悟。但是謝對此不但不感激，而且更加仇恨黨。她還以為她是台灣人的“領袖”，台灣尚未解放，黨對她無可奈何，因此，在黨整風的時候，她便乘機向黨猖狂進攻。

右派分子謝雪紅是一个叛徒，是混进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其危害极大，屡教不改，把她开除出党是完全正确的。

中共农垦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 刘培植党籍的决议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

刘培植，男，现年四十三岁，陕西省宜君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三三年参加共产党。全国解放后，曾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局长，农垦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党委书记等职。

刘培植虽入党多年，但在历次运动中一贯思想右倾，对党中央所决定的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抱抵触情绪，持消极应付态度。他在一九四三年在延安的审干肃反运动中受过审查。甄别后，组织上给他作了无政治问题的结论。但从此他就对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右倾思想。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他不但不积极领导运动，而且对当时组织上积极开展运动的要求，坚决对抗。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时，他放弃了对运动的积极领导，而把大部精力放在追求个人名利的事情上面。在整风运动的初期，大肆活动，支持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争中，农垦部党组先后组织了11次大小会议，对刘培植进行了斗争，根据所揭发并查对属实的材料，刘培植的主要的反党事实如下：

(一) 在大鸣大放时期，向民主党派的右派投降，答应他们发展组织和参与领导的要求。

关于發展組織的問題，他在六月的民主党派座談會上說：“各党派要發展獨立組織，黨同情、支持、幫助”；會后又分別指定人出大字報和通知民主党派成立支部，在給部領導小組彙報時說：“要尊重他們民主党派發展組織的要求”，在九月的鬥爭會上幾次地說：“民主党派大發展是客觀趨勢，答應他們發展，到現在我還不認為是錯”。

关于答應右派分子要求參與領導的問題，他在去年六月的民主党派座談會上說：“黨領導民主党派，參與發動群眾”，“領導決定，難免主觀”；當右派提出“對部的大問題，要參與共同研究，不是形式的。要從彩排到表演，從設計到施工，都要參與”時，他馬上補充說：“還應當加上驗收”，並說“每時期的中心工作，中心任務，全面性的，關鍵性的，群眾性的，政治、經濟問題，都要大家研究”，“各民主党派參與領導，達到團結”；在給部領導小組彙報時說：“在兩次會議上，已解決了如何建立制度來經常聯繫他們來參與領導”，並建議部領導上考慮讓民主党派參加某些部務會議和黨內的會議，在鬥爭會結束後的十月，他還堅持地爭辯說：我始終認為，凡屬方針政策性的大問題，都應當和民主党派共同決定”。

（二）在歷次運動中的思想和言論：在“三反”運動中，他揚言要“保護好人”，“為黨保存幹部”；在肅反運動中，他為對人民有血債的歷史反革命分子、肅反對象馬宗援辯護，說馬是“殺人未遂”罪，並說“如果把馬宗援算做壞人，那麼95%里就沒有好人”又說：“要知道，在運動中保護好人是多么不容易啊！”；在反右派鬥爭初期他說：“农垦部沒有右派”，鬥爭他的過程中他一再辯護說：“當時我就沒有感到右派的進攻”，甚至狂妄自得地說：“我在歷次運動中，總是自己定一個弦”。

（三）由極端個人主義野心發展至反农垦部黨的領導：長期以來就想當副部長，一九五三年由東北調北京後，向中央組織部

提出要求当副部长。在农业部当局长和在农垦部当部长助理期间，散佈了不少詆毀领导的坏話。整風开始后，丑化王震部长的历史，說王部长在革命战争中被国民党军队打得“丢盔擦甲”；攻击王部长亲自领导的密山垦荒工作，不讓別人支持密山，專門搜集密山工作中的缺点，散佈密山垦荒計劃註定要失败的空气，大鳴大放中，力圖把整風的鋒芒引向王部长，以若隱若現的手法在群众中煽風点火，企圖赶王部长下台，背后罵王部长說：“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部长，还不赶快滾蛋”。

(四) 目無組織、目無紀律。妄改和詆毀党的方針政策。如关于国营农場的方針，中央早已規定是“提高产量，降低成本，积累資金，示范农民”四項，但他却因若干农場不賺錢而提出“少办、小办、办好”的所謂“方針”。並把农場不賺錢归咎于农业合作化，說：“农場成本高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帶來的”等。

以上事实說明，刘培植的極端个人主义思想已發展到極其严重的程度，他对抗党的领导 and 运动帶有一貫性，这次整風运动，他支持民主党派的反派分子，出讓党的领导权，反对农垦事业的方針。並且坚持錯誤，拒絕改造，斗争会上惡劣蛮橫，抵賴狡辯。因而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的起碼条件，墮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極右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維護党的团結和統一，根据中央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原則，經支部大会及部党委通过，开除刘培植的党籍。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本部委员会关于陈沂問題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

陈沂任总政文化部长期間，在工作、思想、品質、作風等方

面都表現了許多严重的缺点和錯誤，总政首長对此曾不断地給以批評教育，但他不檢討、不改正，有时表面作些檢討，但檢討之后依然如故。一九五三年总政根据軍委指示檢查文化部工作，一九五六年底又对他的严重的無組織、無紀律、鋪張浪費等錯誤进行了揭發批判；他对此均採取了恶劣的抗拒态度。一九五七年春季，軍委决定文化部併入宣傳部，他对此十分不滿，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一九五七年五月初，他和社会上右派利用整風机会猖狂向党进攻一样，在天津师范学院和总后第四預备学校放火（后者有录音），在講話中散布了許多反动言論，攻击中央軍委及解放軍各总部。一九五七年六月，他抓住馬寒冰自杀事件，挑撥是非，攻击总政領導。在整風中，他对一切批評过他的人进行打击，並企圖將这些人說成右派；而对右派或有严重右派言行但未冒犯过他的人，則一律加以支持保护並設法为之开脫。陈沂的这些表現，总政領導和机关幹部早有察覺，在整風中，有不少幹部对他提出批評。因此，机关党委根据机关党代表大会上代表們的提議和总政首長的指示，召开會議，对他进行批判教育。會議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先后举行过二十五次，在會議上發言的共有七十七人，揭發了大量的材料，証实陈沂有如下的罪惡活动：

一、惡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八兩日，他在天津两个学校的講話中發表了許多反动言論，惡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他宣傳階級斗争熄灭論，反对人民民主專政。他歪曲毛主席在浙江省委的講話，他說：“毛主席講……反革命只有十万分之一，浙江省二千三百万人中只有二百三十个反革命，其中还有些是地主坏分子受管制的”。他說：“今天什么家庭出身的都不成問題，因为他都改造了么，他爸爸过去是資本家，現在也是自由劳动的人嘛！”他又說：“今天同志們也好，外边人也好，他对

我們沒有說非反对共产党不可。……他对你没有什么杀父之仇，为什么非反对你不可呢？”由此，他得出結論，“如果对待这些善良的百姓，还是採取專政的办法，那就是蔣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办法，……那就是自挖坟墓。”

他誣蔑我們党过去对人民实行專政，並竭力說明党中央、毛主席所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被迫的，他号召人們以暴風雨的方式爭取对人民的民主。他說：“階級敌人打倒之后，階級关系發生了根本的变化，剩下的問題就是人民自己之間的問題，‘我們还是要專政，对人民实行專政，採取压服的办法，……还是採取蔣介石的办法，那就是說我們也为我們挖坟墓。’”他說毛主席、党中央所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和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問題已經摆在党的面前，很重要的問題，不这样办就不行了”。“問題不解决，就会發生斯大林的悲剧，就会發生象匈牙利这样的事变！”他很惋惜地說：“根据毛主席自己講，他提得晚了一些。这事情本来就應該比現在早一点提出来，但是提晚了一点”。他又說：“現在提出来也很好，再不提這個問題就多了。”他說問題所以严重，是党内絕大多数人現在还不願这样做。他認為：“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是講我們党同人民之間的矛盾，我們党同人民現在是隔了一道墙”。“这个墙如果不拆开，关系就搞不好”。“我們現在整風就是为了拆这个墙”！如何推倒这个墙呢？他說“不要強調和風細雨。”他認為強調和風細雨“那就是不讓人家来”，他說“和風細雨中間总要打打雷吧！总要有几个閃电吧！那有一来就是和風細雨，沒有这个事情！”“誰喜欢暴風雨，那就来吧！”“你就敞開門放就是！你愛怎么进就怎么进，窗子都打开，你們……隨便！”“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么，不准附加任何条件！”他說“搞民主就要帶点强迫，你說一点强迫沒有，他民主不下来！”

关于匈牙利事件，他作了与党完全相反的分析。他認為匈牙

利事件主要的不是帝国主义和内部反革命長期陰謀活动的結果，而是人民内部的問題。他說：“如果那时匈牙利人民已經在街上示威的时候，如果那时匈牙利的党看到這個問題只是人民内部的問題而採取措施，也还是可以的，因为那时工人的口号就是这样的，‘示威生产兩不誤’，証明他还是要搞生产……就是因为那时党的領導还是採取压服的办法，所以激起群众的义憤，这时反革命在利用，当然也就發生了匈牙利的問題。”他的論点同納吉等同出一轍。

他咒罵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号召要改朝換代。他說：“我們国家社会制度有很多还要研究，这也是要鳴的。”他說：“匈牙利事件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天亡。”他又說：“社会主义經濟基础是好的，而上層建筑太坏了，就要改朝換代，不然，为什么同是封建主义經濟基础，而換了那么多朝代呢？”他留恋私有財產制度，仇視农業合作化，他認為在我們的国家里，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軍人的命运是悲慘的，他說：“咱們这些当兵的，解甲归田，無田可归，告老还乡，無乡可还……。他回了家以后，成了高級合作社，他啥也沒有，房子沒有他的，什么也沒有他的，……这就是矛盾。”

他誣蔑社会主义民主，宣揚资产階級民主，並提出向资产階級民主學習。他說“我們国家沒有經過資本主义，所以我們的生產力發展受到影响；当然我們因为也沒有經過資本主义，我們的民主生活鍛煉也是差一些。当然資本主义是那一套，可是他有些也值得我們来学的，你比方說他互相可以罵么，比如在这里开会，我对你有意見，我就不同意，我就可以站起来質問你，我就可以写文章公开批評你，这也是一个培养哩！我們就沒有这个。因为我們常常是講人家，我們总是正确，我們就是領導人家的！”他主張無条件的言論自由，他說：“知識分子揭穿了，他就要求言論自由……他不要求別的东西，那么，你就應該滿足他，但是你不讓他說，……就会發生对立！”

他公开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並視為这是个人积极性的来源，認為誰批評个人主义誰就是教条主义，就應該加以反对。他說我們党和軍隊总是強調为人民服务，为部队服务；但“对人家的特点，根本不考虑，尤其对人家的前途不考虑。”他說：“他现在当医助，当衛生員，当护士，当司药，难道他能当一辈子，他是要想到我将来会当个医生，甚至会当个大医生。他当然要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有什么錯呢？”“人沒有理想怎么活呢？”他說：“老实說，那个沒有点个人打算呢？……說一点个人打算都沒有，那是騙人的，是不老实。”

二、反党反领导。

根据會議上的揭發，陈沂在总政文化部工作期間，反党反领导的錯誤表現得特別明显，而一九五七年則更有了惡性的發展。

他看不起领导，一貫地破坏领导威信，他認為领导上不懂文艺，不关心文艺，不爱护文艺干部。他在文艺干部中广为散布：“彭总只爱看斬馬謖，根本不懂新文艺！”“彭总說，文化工作少搞点，亡不了国！”借以煽动文艺干部对軍委的不滿。他十分蔑視总政的几位主任，他經常說：“主任不懂文艺特性”，“主任不懂装懂！”“你不懂就放手讓別人幹嘛！”为破坏几位主任的威信，他不惜制造謠言，把主任們描写得十分無知。他罵譚主任“主觀、片面、狹隘，从不重視文艺工作。”罵傅副主任“老糊塗了”，罵肖副主任“胆小怕事，他懂得什么文艺？”罵甘副主任是“山溝里出来的，無知！我連尿也不尿他！”他对中央宣傳部、国家体委的一些負責同志也是看不起的，他說周揚同志“搖搖擺擺，对貫徹中央的文艺方針不坚定！”罵蔡树藩同志是“惡霸”荣高棠同志是“流氓”等等。

他驕傲自大，个人突出，爭名夺利，玩弄权术，个人主义已發展到和党的领导直接对抗不能相容的地步。他把他所领导的文化部門当成一个独立王国，只能向党向上級要支持，要人要錢，

不准党和上級对他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批評。总政几次檢查文化部的
工作，他都採取抗拒的态度。他經常对自己的部屬講：“对上
只有抗、頂才能解決問題！”总政領導上說文工团演“曙光照耀
着莫斯科”一剧用款近兩万元，有浪費，他不但不作檢查，反而
獎他們一千元。总政領導上說文化部工作中有缺点，他就布置文
化部各处把成績都摆出来給領導上看看，趁机大作宣傳。总政領
導上說他决定解放軍代表隊不参加全国奧林匹克选拔賽是个严重
的錯誤，他就說“虽有缺点，但体委也不对！”总政領導上說用
人要經過組織手續，不要随便从外部吸收入，要照顧下面的困
难，不要随便从下面調人借人；但他可以不經組織批准，就自行
任命文工团十几个校官的职务，从社会上招收人，並經常从下面
調人，調不到就借，而且往往有借無还。总政領導上說經費开支
要遵守制度，但他却無組織無紀律不請示报告，就随便批条子、
乱花錢，一而再、再而三。一九五四年他帶文工团出国，很不尊
重我駐外使节的領導，他对我駐苏使館关于不唱“斯大林頌”及
不以“东方紅”作礼仪性首唱歌曲的指示，採取抗拒态度。他自
己想延長在捷克的时间，不經国内及我駐捷使館的同意，即向捷
方提出要延長在捷时间，而向我使館报告时，則又說是捷国防部
長提出的要求……。总之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什么上級和党組織
的。

他为打击領導威信，抬高自己，总是标榜自己如何关心大
家，他常常对下級这样講：“你們大家好好幹，有什么問題我給
你們頂着，为了你們，我已向主任不知作过多少檢討了。……你
們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我能办得了的就給你們办，我办不了的
就給你們往上轉，我上边还有主任啊！那我就决定不了啦！”为
了拉攏群众，他对下面提出的要求，不論合理与否，都随便許
願；但当領導上不批准时，他就把責任推到領導身上，表示他是
关心下面，就是領導上不关心。他特別強調文艺的特殊性，認為
各級政治机关的負責人不學文艺，領導不好，因此就強調部門領

導，強調他的領導，強調為文藝工作爭地位，強調文藝工作應該當作一個兵種來建設，而自己則以軍隊文藝工作的最高領導者自居。他把自己關於文藝工作的一些報告不經請示便編輯成冊，在部隊中廣為散發，並在序言中說：“這些文章可以作為有關部隊文化藝術工作指導思想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來閱讀，來理解”。他多方面地迎合與支持文藝幹部中的錯誤思想，並常常煽動下面向總政、軍委，以至中央寫信，然後他就以“群眾意見”、“群眾輿論”的代表者的資格來和領導上對抗。他常向下面的人講：“我沒有意見，但我上面有主任啊！你們回去寫信么，我給你們轉！帶點情緒也沒關係！”“你們寫信來，我就好說話了！”

他的這種反黨反領導的活動，在1957年發展到了頂點。最突出的表現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1957年春，根據軍委決定，總政文化部併入宣傳部，他在總政部務會議上說：“軍委決定了，我沒有意見，堅決執行，合了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已經作了合併的准备工作。”但在暗中，他却進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動。到處說什麼“宣文合併，根本不征求文化部幹部的意見，是主任對文化工作最大的粗暴！”“宣文合併是一種倒退現象”，“讓主任們對歷史負責吧！歷史會證明這一決定是錯誤的！”“部隊這樣對待文化工作，中央知道了一定不會同意！”他惡意歪曲主任的話，煽動幹部對主任不滿，他說：“人家譚主任講了：宣傳部有思想，文化部有工具，我們幹了這多年，成了沒有思想的工具了！”“什麼宣文合併？還不是為了整我陳沂？”“陳沂有毛病，就撤陳沂的職！為什麼把一個部取消？”當文化部的一些幹部在他的這種煽動下，由對宣文合併有不同意見轉為不滿意時，他的反黨反領導的活動便更加囂張，到處散布散伙情緒。他說：“文化部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沒落時期了。劉志堅是個取消論者，……部隊文藝工作搞不出什麼名堂來了！”“走！大家到地方上去，這裡不要

有人要！”“部队文化工作的路是越走越窄了，部队文化工作算是叫譚主任踢蹬光了！”“有些成就的人都要离开部队了，今后部队还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我們一走，文化幹部就散了。”他在散布了这一些散伙情緒之后，便積極进行分裂活动，具体地安排从部队中拉一批人随他到地方上去。他不經总政同意，便派陈亞丁、魯勤、馬寒冰三人去中央文化部談关于部队文艺幹部的安置問題。对文化部的一些主要幹部，他分別对象，用有拉有打的办法，鼓励他們离开部队。他对陈其通同志說：“你是搞戏的，可以到戏剧学院去么”当陈其通同志表示願留部队工作时，則又諷刺地說：“人家当然不走啦！宣传部副部长么！主任喜欢长征幹部么！”他对李偉同志說：“你可以到音乐学院去当副院长。”当李表示不願离开部队时，他就对人說：“李偉他是不願丢軍銜的，军队薪金高，他是很計較这些的！”他一再鼓励董小吾同志到地方上去，並表示董可以到实验話剧院当副院长，当董到总政話剧团工作后他就对董說：“到話剧团当副团长，小吾啊！你真窝囊！”他造謠說：“总政在安排幹部时，已决定把陈亞丁調出来轉業”，“譚主任对陈亞丁印象不好，”借以煽动陈亞丁同志离开部队。当陈决心留军队工作时，他就說“陈亞丁骄傲了”此外，他还对不少的人进行过这类活动。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把部队文艺工作拆垮！以証明军队离开他，文艺工作就幹不出什么名堂来了；証明军队领导上有問題，他一离开，所有文艺幹部都团结不住了。这个时期，陈沂为了說明他是“吃得开”的幹部，曾到处吹嘘自己，說中央及军委先后为他安排过十多个重要职位。一是上海市委書記分工管文教，並說“我看比夏公（夏衍）可能管得好些，”二是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他說：“人家都說我陈沂有火力，去后，象中央歌舞团等，不多久就可以整好！”又說：“到中央文化部当副部长，我可不当刘芝明那样的副部长！”三是中央对外文化联络部副部长（或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說：“周总理已同意，章明同志已經打电话

通知我了！”四是空軍副政委，他說：“我不想幹，沒意思！”五是砲兵副政委，他說：“主要是考慮我和邱創成的擺法問題。”六是軍事科學研究部政委；七是解放軍報的總編，並把解放軍文藝、解放軍戰士、解放軍三十年編輯部都帶過去；八是把總政所有報刊合併成為出版部，他當部長；九是總政宣傳部長；十是貴州省省長，他說：“你看滑稽不，叫我當貴州省長，一定是周林搞的鬼！”

在宣文合併前後半年多的時間里，陳沂除自己進行反黨活動外，還拉攏一部分人幫他反黨。據寧子、陳亞丁兩同志揭發，在當時的文化部存在著一個以陳沂為首的小圈子，在這個小圈子的人積極維護陳沂，到處為他說好話，替他隱瞞錯誤，甚至支持他的反黨活動。這個小圈子的核心是陳沂、馬塞冰、魯勒等。他們講朋友義氣，提倡“士為知己者死”，追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大吃大喝，彙集並散布流言蜚語，維護陳沂，謾罵領導。有人說這個小圈子很象個“裴多斐俱樂部”。

1957年5月8日他在天津總後第四預備學校的講話，除系統地發表了許多反動言論外，還集中力量攻擊了軍委和解放軍各總部。這是他反黨反領導又一次集中的表現。

他誣蔑軍隊不敢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他說：“我們軍隊還是這個問題上不放手、不敢、怕！……就是怕提反對意見。”因此，他號召大家“要求爭、要求鳴。”

他誣蔑我們軍隊已經完全脫離了群眾。他說：“我們軍隊進城以後，……知識分子不來往，農民不來往，工人不來往，作生意的人更不來往，要來往就是搞點東西。這個東西就很危險啊！這是脫離群眾！”

他誣蔑我們軍隊毫無民主氣息。他說：“這些年來強調正規化，強調軍官、士兵、將軍、校官、尉官，強調這些東西，強調‘奉命來到’，這樣確實把我們的關係弄得相當疏遠。有時候是

假的。”又說：“本來我們部隊官兵關係是最親密的，現在弄得是有点格格不入。”又說：“尤其是我們軍隊，又是首長制，命令，前一時期還在強調‘單一首長制’，就叫作‘首長是神聖不可侵犯’！這當然就沒有法子容易听人家反面的話了！”

他誣蔑我軍到處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已統治一切。他說：“我們關在營房里边訓練，關在學校里學習……這樣關起門來搞的結果，同人民不接觸，同國家社會不接觸，那我們只有搞教條主義，除了教條主義還搞什麼！”就連批評個人主義、批判富農、富裕中農思想他也稱之為教條主義。

他用盡心機，不惜製造謠言來丑化軍委及各總部的領導。在他的描繪下，軍委及各總部的官僚主義已經達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他造謠說：1957年軍委確定所有尉官不發衣服，甚至連戰士、班長都不發，只是遭到全軍反對才又發了；1957年規定尉官都不晉級，1956年是行不行都往上提，1957年就一律不動；1957年規定所有復員軍人都要處理完，就給海空軍造成了麻煩……等。他在製造了這一系列的謠言之後，就給軍委和各總部加了許多罪名，他用責備的口氣說：“這不是自我矛盾？本來這些事情就不合理，你非要這樣主觀主義的規定！”“這矛盾不是製造的更大嗎？”“都不對頭么！”“你們安排這些事情就是太隨便了一點！”“還了得！”“你不考慮得周到一點，一下子硬往下推，下邊真受不了！”“我們軍隊象這類事情簡直相當多哩！這怎麼不會有矛盾呢？”為什麼軍隊會是這樣的亂七八糟呢？陳沂的回答是：“這是彭總講的，首先是軍委嘛，軍委有責任，軍委要考慮這些問題，領導機關有責任，所有這些都是要經過批准的么！”

1957年6月底陳沂又利用馬寒冰自殺事件進行了一次大的反黨反領導活動。

從會議上許多同志所揭發的事實來看，馬寒冰是一個政治品質、思想作風很不好的人，和陳沂氣味相投，所以陳對馬十分器

重，使馬一身兼三職。馬的許多錯誤他是知道的，但都包庇下來，並且慫恿他。馬對黨內鬥爭的看法也和陈一樣，認為黨內鬥爭就是個人恩怨，就是宗派鬥爭。例如：1955年馬對丁玲、陈企霞反黨集團的看法，就認為是宗派打擊。因之當總政決定馬不帶青年藝術團出國留下整風時，馬即認為黨內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黑暗勢力要想把他整倒，對黨極度不滿，因而走上了叛黨自殺的道路。馬在自殺之夜，曾在陈沂家中說了许多對總政領導不滿的話，當時陈沂對他不但不予教育批評，反而火上加油，和馬寒冰、魯勒共同發泄對總政領導的不滿。根據魯勒、李偉同志揭發，陈沂當時沒說過一句正確的話，所有的話都是攻擊總政領導，目的是為了抵抗總政的決定，爭取改變這一決定。如，他曾說：給馬提意見的人是小人，是人身攻擊，是報復；秘書處印發材料是破壞人家的名譽；主任們主觀，偏聽偏信，……等。馬自殺後，他就利用當時文化部一些同志因不了解情況所產生的一些不滿情緒，在文化部掀起一個反領導的風浪。他在馬寒冰的尸體面前宣誓似地說：“我要控告！”他向許多人講：“總政首長偏聽偏信，是官僚主義逼死人！”還說什麼“總政首長到該接受些教訓的時候了”他贊揚馬寒冰是“詩人氣質”，並說：“士可殺不可辱”“老馬早就說過，不定什麼時候來他個尸諫，”將叛黨者比為屈原，把領導比為暴君楚懷王。當總政召開幹部會討論馬寒冰自殺問題時，他曾暗中对人說：“這是譚主任心虛，想把事情壓下去！”會議上很多人發言說馬的自殺是叛黨、叛變革命，他就說：“這真是十足的教條主義！”而對於個別在會議上因馬的自殺公開攻擊總政領導的人，則倍加贊揚；當會議上有人批評陈沂是別有用心時，他暴跳如雷，揚言：“再這樣，矛盾的性質就要變了！”陈沂上述這些話不僅向軍內外的一些幹部講了，而且也向馬寒冰的妻子張玉蘭講了，並造謠說：“告馬寒冰的韓淮是右派”，使她在痛苦之余，又加上對總政首長的不滿，要向軍委、中央和周總理告狀。

三、在整風中压制鳴放，支持与袒护右派分子和有严重右派言行的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总政领导。

陈沂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开始后的第一次鳴放时期，企圖把斗争鋒芒引向总政领导，他曾說：“我們的教条主义算什么！我們又决定不了問題，主任那一关打不通，鳴放半天什么問題也解决不了。这次鳴放如再冲不动官僚主义，部队的文艺工作就沒有希望了！”当解放軍报社召集文工团幹部开座談会时，他很兴奋。在會議上有不少人对总政、軍委在文艺工作领导方法进行了攻击，他兴高采烈地对別人說：“看主任怎么处理！”並向原他的秘書張仲彬等同志說，你們可以写信給毛主席，請主席用几分鐘的时间听一下这个录音，那怕几段重要的也好！他的“文艺杂談”犯了“左傾”教条主义的錯誤，毛主席批評了他，但他不檢討，反而写文章把責任推向总政领导上去，此文肖副主任未讓發表，他对此不滿，認為一到主任那里就批評不得了。解放軍文艺社召开座談会，会上对他的文艺思想上的若干問題进行了批評，他暴跳如雷，說“我这个部長还没有撤职！”說座談会是“缺席审判”，並到編輯部大吵大鬧。当會議紀要發表后，他就打电话給解放軍报社、总政宣傳部、解放軍文艺社、人民日报社提出質問。一九五七年六月，他曾以“冬今”的化名写了一篇“胡可的疙瘩可以解开了”的文章，在“解放軍文艺”七月号上發表，假借第三者的身分来抬高自己，討好胡可，打击领导；並动员宁干同志按照他这篇文章的方向来写文章，企圖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总政领导上去。当別人發覺这篇文章是他写的以后，他便打电话罵解放軍文艺社的編輯，說編輯泄露了他的底是違背了編輯人員的道德。

在整風反右斗争中，他对向党进攻的人表示同情、支持，並为之开脫。天津师范学院有个右派分子写了一篇“狂人日記”，最露骨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陈沂在該院講話时，非但不加

批評，反而稱贊它，說寫這篇文章的人有才，應該支持；認為學院批評這個人是大驚小怪，是教條主義。該學院的右派分子要辦同人報，他表示同意，並要學院拿幾千塊錢給以支持。一九五七年六月底，他在錦州對三個文工團講話，挑動文工團員不滿。當時文工團員李國權說：“親愛的陳部長，你是偉大的太陽，我們是在太陽底下把冤伸！”他听了這些話洋洋自得，加以默認。他自反右派鬥爭開展以來，曾在各種報刊上發表過十幾篇反右派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目的，一是表白自己是左派，二是借反右派之名，將觸犯過他的人一律按右派打。最明顯的是他曾散布謠言說“魏巍有問題”，“杜烽、胡可同徐光耀是小集團”，“虞棘肅反中有問題”，“韓淮是右派”等，並經常督促別人去整這些人。但他對有嚴重右派言行的人，只要沒有觸犯過他的，則予以同情，並幫助他們開脫，認為這些人所以成為右派是由於個人恩怨打擊報復。說“文化部的一些人所以有了問題，還不是宣傳部為整我們召開了那麼多座談會才冒出來的！”並曾感嘆地說：“唉！都成了右派了！”當文工團丁里、胡果剛、史行的反黨言行受到批判時，他就說這是由於陳其通同志的打擊報復。他給丁里打電話說：“丁里！你在家裡幹什麼？無事改改你的劇本吧！你的錯誤就是不積極嘛！”和胡果剛本人及其他一些人講“胡果剛反陳其通就反陳其通嘛！為什麼老談領導領導的！”他又說“史行是忠心耿耿的”。宣傳部的黎明和創作室的白樺錯誤嚴重，但他偏說：“黎明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老按着他鬥呢？”並阻止白樺回雲南整風。

四、品質作風十分惡劣

陳沂經常對他親近的人講：“你們年輕，在黨內生活的時間短，不懂得黨內鬥爭是怎么回事，這一套我了解！”在他的心目中黨內生活是沒有是非、沒有原則的人事關係，黨內鬥爭就是個人恩怨。因此，他就很注意機巧權術。他慣於製造謠言，挑撥是非，製造矛盾，又利用矛盾，表面一套，背後一套，拉拉扯扯，

吹吹拍拍，並用一切办法給反对他的人以报复打击。

他慣于造謠說謊。他經常向別人講，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这个元帅、那个元帅曾对他說过什么，指示过什么，借以証明他自己正确，中央、軍委的領導同志支持他。因中央、軍委首長有很高的威信，同时他以傳播的話，下边也無法核對，自然信以为真，但事实証明很多是他在造謠。例如許多人批評他提出的部队文工团以歌舞为主的方針不妥当时，他就造謠說：“罗主任說了，以歌舞为主的方針是正确的”，又如，总政几次部务會議决定，罗主任当时也指示他将京剧团交地方，但他拒不执行，反而造謠說：“罗主任是不同意京剧团交地方的！”一九五四年他帶文工团出国，他向国内請示要求將外国發的零用錢匯回国内解决个人困难，总政及外交部复电不同意，他就發来一个說謊的电报，說“剩余的款項留交了使館”，但实际上將大批的錢分光並匯到国内来了。他为了攻击某一个領導人，他什么謠言都可以制造。例如他說：“我和譚主任在东北时期就有爭論，我是拥护正确路綫的！”肖副主任因他下令解放軍代表隊拒不出席全国奧林匹克选拔賽，在体委會議上严格地批評了他，他就造謠說：“肖主任冷酷無情，临走时連个車也不讓搭！”傅副主任因他在“同志間”剧本演出問題上表現了兩面三刀的态度，批評了他，他就对李偉同志說：“傅主任对你非常不滿意，你为什么在邀主任上台祝賀演員时，不讓他第一个上台呢？人家可注意这些哩！”

他慣于挑撥离間，播弄是非，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例如他經常給他的下級講：“我是关心你們的，能办都办了。但我上面还有主任啊！”一九五三年軍委决定由甘副主任檢查文化部的工作，他就趁机造謠挑撥肖、甘兩位副主任的关系。他对主持檢查的刘其人同志講：“老刘呵！肖主任对这次檢查很不滿意，他給我說，叫他們檢查去，反正杀不了头！”他对其他一些同志講：“什么檢查文化部工作，还不是甘主任为了整肖主任，是我陈沂

替他挨了！”当检查结束，肖副主任在会议上批评了他的骄傲自大、自由主义、無組織無紀律之后，他在会后对许多人讲：“你们不了解，肖主任批评我们还不是为了给甘主任下台阶！”他为了挑拨傅副主任与其他几个主任的关系，他对人甚至在会议上说：“傅主任很博学，也关心文化工作，就是说话不顶事！”“他批了的东西也不算数，秘书处还得拿到别的主任那里批！”他为了攻击谭主任，就散布说“谭主任把总政老部长都排挤走了，都提了他的一些人！老部长们对此都很有意见！”他对不少人说“谭主任周围有一批小人，专门找别人的缺点，你们可小心呵！”内蒙军区文工团编制三十人，本系根据文化部的意见确定的，后来内蒙军区要求将三十人扩编为六十人，他不经过总政同意就私自答应了，也从未向领导上报告过。但当内蒙请示总政，总政不批准，内蒙军区有个干部给罗主任来信表示不满时，他就在信上批上这样挑拨性的字句送给罗主任，“这个问题不是一般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我多次提出，但领导上总不考虑，我觉得象这样的事，不让你知道也不好。”他对彭总不满，就在文工团军衔问题上进行挑动。他对文工团讲话说：“不知怎么文工团的军衔就没有了，这事连彭部长都不知道，我曾把这事反映给彭部长，彭部长说‘为什么文工团没有军衔，这是谁下的命令？’我说还不是你国防部长下的命令？”他对他的下级也是如此，总是两面态度，逢甲说乙，逢乙说甲，造謠挑拨。例如：丁毅同志由中南调来总政时，他就对陈其通同志说：“丁毅在中南不知说了你多少坏话！他得了斯大林奖金后骄傲了！”“但他搞歌剧，谭主任是喜欢的！”而对丁毅同志则又说：“陈其通这个人难搞，我介绍你去当歌舞团长，他不要！”“你斗陈其通是斗不过的”，你搞你的，让他搞他的吧！”

他是一个徹头徹尾的两面派，他善于伪装自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文章是一套，实际又是一套，对上是一套，对下又是一套。他在一些文艺论文和讲话中，表面是讲要面向连队，为兵服

务，強調战斗性、群众性；但实际上却到处鼓励与支持文艺幹部的一些錯誤思想，鼓励他們当名作家、名演員，鼓励文工团專業提高，忽視普及工作，重技术，輕政治，並認為如果不讓文工团搞專業提高就是誤人子弟。他在表面上是強調文艺要写正面人物歌頌新英雄人物的，但却又鼓励“解放軍战士”的編輯們多写諷刺小品，扩大批評和諷刺的范围，去批評和諷刺軍官。他表面写文章提倡民族形式，但对文工团研究民間歌舞則不支持。他敌我不分，包庇反革命，私人安插了那么多政治上不清楚的亲屬在部队工作，但却在肃反时一篇又一篇地發表文章，說什么“同老虎在一起睡覺是不行的！”“帶槍的人應該学会怎样对待不帶槍的反革命”，並且号召大家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来正确对待自己反革命的亲屬。写了文章还不算，还要再把这些文章匯集起来印成小册子。整風中，他到处煽風点火，与右派一起瘋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但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發表反右派的文章，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左派。他犯了錯誤，在抵賴不过时就作假檢討；但檢討一过，則又故态复萌。他經常在檢討过后向別人講：“反正我就是那一套，叫什么时候檢討，我就檢討，到什么时候你們不听了，我就不說了！”他为了攻击別人，表彰自己，常常用化名写文章。为避免別人識破他的笔迹竟叫自己的小女孩为他抄稿，易地投邮。

他善于鑽領導上的空子。他的手法是：凡是他的直接領導上級总政主任不同意办的事情，他就到更高的上級去鑽，鑽成了，就以此炫耀自己如何能幹。凡是这个主任不同意的，他就到那个主任那里去鑽，但絕不談前一位主任的意見，如果第二个主任同意了，他就馬上办，說主任已經同意了。如果第二位主任也不同意，他就到第三位主任那里去鑽，也絕不談以前兩位主任的意見。如果第三位主任同意了，他就办，說是主任已經同意了。他把幹部看成是若干不同的宗派，經常講某某人是那里来的，是那个老总的，誰喜欢他……等。当总政檢查他的工作或他遇到什么

批評，或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就把真象有意隱藏起来，到处向高級首長进行活动。企圖鑽領導上的空子。一九五三年軍委檢查文化部工作时，他曾先后動員过董小吾找賀总，丁里找聶总，李偉找罗主任，陈其通找周总理为他說好話。至于動員一些文艺幹部給軍委、中央写信支持他陈沂的事情，那就更多了。

他对幹部是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極不正派的。平时对幹部的要求尽量給予滿足，要人就給，要錢就批，幹部犯了錯誤，他为之袒护，想成名帮助成名，想出国帮助出国，因之有若干的人受他蒙蔽。他強調朋友关系，講感情义气，提倡“士为知己者死”。在他領導下的文化部，自由主义、無組織無紀律、謾罵領導是合法的；但这只能对其他部門对总政領導，而对他則是絕對批評不得的，对他的錯誤則更不能揭發，誰要是冒犯了他，他就可以抓住把柄加以打击报复。如董小吾在男女关系上有錯誤，平时他都知道，但不追究不处理，因当时董竭力維護他；但当董随文工团出国，向主任写信揭發了他在国外的一些缺点錯誤后，他就不顧总政“待回国后再处理董的錯誤”的指示，急忙在国外組織对董的斗争，並声称董是反党反領導，是小高饒，力主开除董的党籍。

他在处理經濟問題上，对公家的錢是“揮金如土”的，借以籠絡幹部收买人心。如八一队比賽得胜，他不是从政治上鼓励他們警惕他們不要驕傲，而是常常以大批的物質給以獎勵。文工团员教蘊瑜患病住协和医院时，他就專門为教另僱两个特別护士，每人每日工資12元；共用去特別护士費1123元，据协和医院談，除美国石油大王的兒子住院时僱过特別护士外，还不記得中国人有这样办过的。自一九五二年“三反”之后，他不經总政領導同意，或用先斬后奏的办法，在供应处業務經費中先后批用了五十余万元，其中有很多是不應該用的。他的文章往往一稿几投，同时拿稿費，就連由別人代笔以他的名义發表的文章，稿費也据为已有。有时他的文章在报上剛剛登出，他就打电话要稿費。前面提

到过的他出的一本“把解放军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的书，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在一些会议上的报告。这些报告大部分是文化部的一些同志起草后经过他修改，讲过后又由其他人整理的。这些文章先在八一杂志、文化工作手册和解放军文艺上登了，拿一次、两次稿费，然后再匯集成册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拿版税，并用公家的钱印二万余份向部队分发。文化部长审稿本是自己分内的工作，但他一九五七年审阅了解放军画报社的十一份图片即收审稿费二百四十元。他公私不分，将公家的收音机、照像机据为己有，不仅一个，而是若干个，不仅自己用，而且当作私人礼物送人，甚至将两个汽车轮胎、一架美式军用收音机也想法出卖变钱。一九五四年他带文工团出国，在他的主张下，违犯国家规定，浮报冒领了国内零用补助费五万余元，并将不该分给个人的一些演出收入也分了。他出国一趟夫妇二人除在国外买了电气冰箱、家庭洗衣机、吸尘器、小孩车、衣料等以外，回国后还落得现金三千九百元。

除上述四个问题外，会议上还对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陈沂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在整风中态度却极不老实。开始时，他不愿参加整风，当他的问题开始在文工团及机关党代表大会上被揭发，肖副主任通知他参加机关整风后，他就进行了一连串的非组织活动，他找了許多原文化部的人谈话，在谈话中，使用了不少威胁、拉拢、挑拨、离间的手法。他用威胁的口吻和别人说：“反对我的可多半是右派啊！”在整风会议进行过程中，陈沂的态度也极为恶劣。开始时对别人的发言听不进，有时发脾气。十二月七日他作了检讨发言，他虽承认自己身上还存在着一些毛病，但对重要事实却不敢正视，或推卸责任。特别是一些大大是小非的问题，他都說成小是小非，或者根本没有什么错误。他说他在天津两个学校的讲话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虽然有些地方不够妥当，但这只是由于他讲话时不注意，是“信口开河”、

“禍从口出”。

根据以上事实，机关党委一致认为陈沂是一个極端的屡教不改的資产階級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徹头徹尾的兩面派分子，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他驕傲自大，目空一切，抱有强烈的个人名利野心，因而他就把他所領導的文化部当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成为他获取名利的工具。他拒絕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評，抗拒党对他的領導和监督，打击任何妨碍着他的名利發展的人。所以，一九五七年，当軍委决定將文化部併入宣傳部，当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向党發起进攻的时期，他就很自然地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反党、反領導、反社会主义，变成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

为了教育幹部，肃清他在部队文艺幹部中所散布的毒素，和他在社会上的恶劣影响；为了巩固党的团結，維護党的紀律的严肃性；机关党委决定將陈沂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此决定已經总政治部、軍委、中央批准)

中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編輯部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用文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日

(一)

陈用文，原名陈祖杭，男，四十岁，南京人，破落商人家庭出身，本人成份職員（在金陵兵工厂名义是艺徒，实际前三年替領導开單据領材料，后三年多在成本會計科抄写），回族。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股長、研究員，晋察冀边区总工会任执委、秘書長、中央政策研究室

研究員，全國總工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秘書處處長，辦公廳第二副主任等工作。一九五〇年至現在，任工人日報社長和工人日報分黨組書記，一九五七年任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

(二)

一九五六年十月，當英美帝國主義和南斯拉夫鐵托集團製造匈牙利反革命叛亂，在世界上掀起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逆流的時候，陳用文正從南斯拉夫訪問回國。他於同年十一月在工人日報上發表了“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竭力宣揚鐵托的修正主義，美化南斯拉夫，宣揚南斯拉夫的工人理事會的作用，吹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的成績，鼓吹南斯拉夫沒有官僚主義。此外，他還到處作報告，並在報社開座談會，全面地宣揚鐵托的道路。

一九五七年春天，當國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進攻的時候，陳用文於同年五月，發表了反動文章“西行紀要”，和右派分子里應外合。在這篇文章中，陳用文大肆攻擊黨，把黨說成是社會前進的主要障礙，污蔑黨干涉和破壞了工會的獨立性，公開宣揚工會和黨可以不一致，鼓動工會幹部可以用團結——鬥爭——團結的方式去克服黨的“片面性”；咒罵群眾在組織上服從黨是“宗派主義傾向”；他利用工人中的落後思想、利用監督，煽動群眾向行政作鬥爭；鼓動工人要求極端民主，他對工人階級極力丑化、污蔑，把工人說成都是自私的。他誇大我們工作中的個別缺點，把整個西北地區說成漆黑一團。

陳用文的這兩篇文章和美化南斯拉夫的報告，成為上海、江蘇、山東、廣東、廣西、山西、安徽、河南等省市工會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的炮彈，並且在廣大工會幹部當中引起了嚴重的思想混亂。

此外，陳用文還以工人日報社長的地位，八年來利用報紙進

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他利用报纸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远在一九五〇年，陈用文就在报纸上散布党不能领导工会的谬论；第一次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决议一直不在宣传中认真贯彻；抓住机会就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更严重的是：在工会“八大”以后，陈用文在“遵守工会章程”的社论里，对中央规定的“中国工会是按照产业和地方相结合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工运方针，采取了公然抗拒的态度。说什么“这和‘七大’章程在实际工作中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去年右派大举向党进攻时，陈用文不理中央“工人日报以生产宣传为中心”的指示，除自己抛出反党纲领“西行纪要”外，还要编辑部“对企业内部矛盾可以放手揭”，“工会工作要冲破圈子鸣”，此外，他还一贯利用落后群众来信，加以集中夸大，恶毒攻击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三)

陈用文热衷于这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不是偶然的。陈用文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因袭了旧商人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衣钵。他参加党是抱有卑鄙的个人野心的，企图利用党作为他向上爬的工具。一九三七年他在延安曾签名加入过由托派分子所发起的“卡尔学会”。一九三八年在汉阳兵工厂闹个人突出被捕，曾使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一九五一年曾犯过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严重错误。在工人日报期间，对历次政治运动一贯消极抵抗，同情反革命和右派分子，把工人日报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对待干部用尽打、拉、吹、拍、骗等资产阶级各种权术。生活上也是腐化堕落的。多少年来，党对他的反党思想和行为，曾不断进行教育和批评，但他都采取两面手法，拒绝改造。陈用文在前述的反党的罪恶活动揭发后，态度极不老实，不肯主动交代全部罪行，企图蒙混过关。陈用文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他已经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成

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兇惡的敌人。因此，支部大会于八月三日一致决定开除陈用文的党籍，並撤消其一切职务。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开除 右派分子孙汉卿、矯楓、崔介 等七人党籍的报告

中央：

今年春天，青島市委在整風运动中徹底揭發了市委書記处書記孙汉卿（省委委員）、矯楓，副市長崔介，市委委員、宣傳部長孙朴風，文教部副部長余光前，国棉一厂党委書記王偉等人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惡活动。同时並揭發了青島日报社总編輯顧膺陰謀篡改党报性質、与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勾結向党进攻的罪行。

对于孙汉卿等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省委已派人去青島进行了認真負責的查对，証明完全屬实。为此，省委除完全同意青島市一屆二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开除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顧膺党籍的決議，同意其建議决定开除孙汉卿的党籍外，並确定余光前作为坏分子处理。但在最后具体处理上，可根据他們对待錯誤的态度和悔改的程度有所区别，以体现党的政策。特此报告。

中共山东省委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青島市第一屆代表大會
第二次會議關於開除矯楓、崔介、孫朴風、
余光前、王偉、顧膺黨籍及建議省委
開除孫漢卿黨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通過)

中国共产党青島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及一屆二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堅決地貫徹執行了中央的整風指示和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的方針，徹底地揭發批判和粉碎了市委書記處書記孫漢卿，市委書記處書記矯楓，青島市副市長崔介，市委委員、宣傳部長孫朴風，市委文教部副部長余光前，國棉一廠黨委書記王偉等人所結成的右派反黨集團及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代表大會討論審查了並一致同意市委“關於以孫漢卿、矯楓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問題的報告”。代表大會一致認為：這是青島黨組織內一場兩條道路鬥爭中的敵我鬥爭。青島黨組織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確領導下，取得了這場鬥爭的勝利。這場鬥爭的勝利，對於增強青島黨組織在中央和省委統一領導下的團結和統一，對於純潔和鞏固青島黨的思想與組織，對於提高青島黨組織的覺悟和戰鬥力，對於促進和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會議揭發的材料證明：孫漢卿和矯楓是這個右派反黨集團的頭子，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惡活動，他們已經完全墮落成黨內右派分子，他們是黨的叛徒，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孫漢卿和矯楓勾結在一起，堅決的反對和破壞在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大鳴大放時，他們積極

心，千方百計的抗拒中央的方針政策路綫和省委的指示。他們反對貫徹毛主席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方針，反對中央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的方針，反對中央和省委關於反右派鬥爭的指示。企圖用他們的資產階級主張代替黨的方針政策路綫。

會議揭發的材料證明：青島市副市長崔介是右派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是黨內的右派分子。他平日與青島民建副主委、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葛慎修稱兄道弟，親如家人。大鳴大放時，他鼓勵和支持葛慎修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反右派時，他為葛出主意，改文章，以掩蓋葛慎修的右派面目，陰謀保護葛慎修過關。他鼓勵支持青島民革主委、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徐一貫向黨進攻，稱贊徐一貫攻擊黨的領導、攻擊肅反運動的反動謬論，支持徐一貫提出為反革命翻案的四項反動主張。在向右派分子孫朴風開展鬥爭的市委全體（擴大）會議上，他不揭發鬥爭右派分子孫朴風，反而攻擊市委，陰謀從市委內部製造混亂，救出孫朴風。崔介同右派反黨集團頭子孫漢卿、矯楓結合在一起，進行奪取市委和市人委領導權的反黨活動。他經常散布流言蜚語，攻擊市委和市人委的領導，他同孫漢卿、矯楓結合在一起在市委和市人委搞了一個反黨中心。崔介的反黨活動早就開始了，土改時包庇地主，入城後成了向明等人進行反黨活動的幫凶，並繼承了向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綫，包庇反革命，生活腐化，道德敗壞，完全喪失了革命意志。

會議前揭發的材料證明：市委委員、市委宣傳部長孫朴風是右派反黨集團的骨幹分子，是黨內右派分子。他在大鳴大放時，積極的支持和宣揚儲安平“黨天下”謬論，稱贊儲安平的謬論是“挖到老根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市一屆三次政協會議上公開的背叛黨和黨外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起向黨進攻。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省委宣傳會議上，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互相勾結，一唱一和的向黨進攻。他極力支持十七中學的右派分子召開大會向黨進

攻，並贊揚右派分子對黨的攻擊是“馬列主義”。他積極宣揚草木篇“藝術性很高”、“表達頑強性突出”。並仿草木篇作詩污蔑黨，頌揚右派分子。他污蔑黨的肅反運動“違犯憲法”，污蔑黨的幹部“和國民黨一樣”。他利用黨的思想工作陣地散布人與人的關係“沒有以經濟為基礎的階級界限了”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反對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把黨的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同官僚主義混為一談；他散布“壟斷資本集團本身的矛盾也是戰爭與和平的矛盾，是為了利潤要戰爭與為了利潤不贊成戰爭的矛盾”的謬論。在反右派鬥爭時，他極力反對中央關於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指示。他同右派反黨集團頭子孫漢卿、矯楓結合在一起搞了個反黨中心，企圖篡奪市委的領導。孫漢卿的反黨活動是有歷史根源的，他出身於地主家庭，抗戰初期因貪生怕死政治動搖，受停止組織關係的處分。一九四二年黨派他回原籍作地下工作，他沒作工作，反而動員群眾資敵。

會議揭發的材料證明：市委文教部副部長余光前是右派反黨集團的成員，是黨內的右派分子。她平日為孫漢卿、矯楓、崔介奪取黨、政領導權積極活動，散布流言蜚語，攻擊市委領導。她為右派分子孫朴風打掩護。在一屆二次黨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她蠻橫的數次打斷別人的大會發言，阻止對右派反黨集團的揭發。她為右派反黨集團訂立攻守同盟，為右派反黨集團拉攏同情人，為右派反黨集團打掩護，她造謠污蔑黨代表大會預備會議。在會議揭發批判她的反黨言行時，她拒不到會，並蠻橫的說要砸倒牆打死組織上派去要她交代問題的同志。她平日生活腐化，道德敗壞，狂妄跋扈，毫無共產黨員氣味。

會議前揭發的材料證明：國棉一廠黨委書記王偉是右派反黨集團的成員，是黨內的右派分子。他參加了一個反黨地下組織“文友社”。他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緊密配合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他對山東大學部分學生在右派分子煽動下鬧青島日報社興高彩烈，他在右派向黨進攻時積極配合指示在全廠廣播“民盟發展

史和在革命中的作用”。他造謠污蔑黨的、中國人民的領袖。他贊揚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他竭力宣傳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他與右派反黨集團頭子孫漢卿結合起來進行反黨宗派活動，散布流言蜚語，污蔑和攻擊市委的領導，陰謀使市委負責同志從基層選舉中落選。在一屆一次黨代表大會上他積極支持孫漢卿、矯楓打擊排除異己、安插親信的陰謀活動，造謠陷害黨的好同志。

上述材料證明：孫漢卿、矯楓、崔介、孫朴風、余光前、王偉等人，都是黨內右派分子。他們結成了右派反黨集團，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惡活動。這個右派反黨集團，以孫漢卿、矯楓為首，他們對黨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但是他們一直拒絕黨對他們的批評教育，至今沒有悔改的誠意，不肯向黨向人民低頭認罪，特別是孫漢卿的態度尤為惡劣，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

代表大會一致指出：孫漢卿、矯楓、崔介、孫朴風、余光前、王偉等人是竊居了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右派分子，他們所進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惡活動，對黨的事業的危害是極大的。也必須指出：由於黨中央和省委的正確領導，由於市委和各級黨組織堅決的、忠實的貫徹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路線和省委的指示，由於青島市各級黨組織基本上是團結的並團結了全市人民，青島市一年半來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成績的。但是由於孫漢卿、矯楓、崔介、孫朴風、余光前、王偉等右派分子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惡活動，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黨的威信，損害了黨的團結，妨礙了黨的統一集中領導，削弱了黨的戰鬥力。因此，必須把他們清除出黨。

代表大會一致決議：撤銷矯楓、崔介、孫朴風、余光前、王偉黨內的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並向有關方面建議撤銷他們的一切行政職務。鑒於孫漢卿是省委委員，代表大會一致決議：建議省委撤銷其黨內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並向有關方面建議撤銷其一切行政職務。代表大會一致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維護黨在政治

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純潔，使黨在緊急關頭，經得住風險。也只有這樣，才能使青島黨組織更好的團結在中央和省委的統一領導下，依靠廣大群眾，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歷史任務。

根據會前揭發的材材證明：市委委員、青島日報社總編輯顧膺是黨內右派分子。他陰謀篡改黨報的性質，從根本上否定黨報是階級鬥爭工具，散布“報紙是商品”，“要象公共汽車那樣，不論誰上都行，不論誰的文章都登”的反動謬論。污蔑在我們國家里沒有新聞自由，“記者遭遇到種種困難”。他陰謀奪取黨對報紙的領導權，主張“再成立一個編委會與黨報編委會共存、監督、爭鳴之”，主張“辦兩種報紙”與黨報“唱對台戲”。他極力反對、攻擊省委和市委對黨報的領導。並同以孫漢卿、矯楓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分子有聯合的反黨活動。他污蔑黨的肅反運動“違犯憲法”。在黨外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時，他興高彩烈的稱贊為“真是大好時光”。他與黨外右派分子勾結一起向黨進攻，他要“動員輿論”，“轟出一個全市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浪潮”。在一九五七年市一屆三次政協會議上，他明目張膽的和黨外右派分子陳仰之勾結起來，向黨進攻，陰謀迫使黨承認右派分子在政協會上對黨的進攻是“正確”的。

代表大會一致決議：撤銷顧膺黨內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並建議有關方面撤銷其黨外一切行政職務。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是萬惡的根源。孫漢卿、矯楓、崔介、孫朴風、余光前、王偉和顧膺都是極端自私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他們都有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念念不忘個人的名利、地位。在他們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得不到滿足時，就對黨不滿，進行反黨活動，以至墮落成黨內右派分子，成為黨的叛徒。這是他們一步步的走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共同道路。這是他們墮落成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黨內右派分子的思想根源。

孫漢卿、矯楓、崔介、孫朴風、余光前、王偉和顧膺所以墮

落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我們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历史时期，資本主义所有制被消灭了，資產階級也正在被消灭中，資產階級分子正在被改造中。但是階級斗争还没有熄灭，資產階級的政治观点和資產階級的世界观还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还将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这种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特别是在政治上階級斗争激化的时候，党内的这种斗争也必然会激化起来。孙汉卿、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和顧膺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發展的时期，最后同党决裂，墮落成党内右派分子，正是这一矛盾和斗争的具体表现。他們大都是出身地主家庭或受剝削階級影响很深的旧知識分子，他們入党以后，一直没有自我改造的自觉性，甚至拒絕党對他們的教育改造。保持着剝削階級的思想本質。他們的这种剝削階級本質，同党的原則、同共产主义思想、同党与人民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一有机会就力圖散布他們的影响，企圖按照他們的資產階級面貌来改造我們的党。如果說在前几个革命时期他們的真正面目还可以掩盖，但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特别是在进行深入的徹底的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他們就不可能掩盖住其本来的面目，党要进行深入的徹底的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們却要按照資產階級面貌来改造我們的党，因此他們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惡活动，直到最后同党决裂，墮落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成为党的叛徒。这就是社会階級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就是他們墮落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

从揭發出来的材料可以看出，孙汉卿、矯楓、崔介、孙朴風、余光前、王偉和顧膺等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同党外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样。他們積極支持党内外右派分子並亲自出馬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争时，他們千方百計的保护右派过关。他們处心积虑的进行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和統一的罪惡活动。他

們歪曲、篡改中央的方針政策路綫和省委的指示。他們的这些罪惡活动，集中的反映和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願望，同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也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党同他們展开的斗争，是兩条道路斗争中的敌我斗争。青島党組織由于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結一致，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为了增强青島党組織在中央和省委統一領導下的团結和統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完成党所賦予我們的光荣任务，代表大会認為全市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必須吸取以下的教訓：

第一，必須把整風与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必須把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須坚决貫徹执行中央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的方針。这样就既能很好的暴露和解决兩条道路斗争中的敌我矛盾，也能很好的暴露和解决兩条道路斗争中的人民內部矛盾。这样，就一定能鍛煉提高左派，一定能团結教育改造中間派，一定能打垮反革命派——右派。这样就一定能推动社会主义事業一日千里的飞躍前进。

第二，必須坚决地、忠实地貫徹执行中央的方針政策路綫和省委的指示，反对对党的方針政策路綫的任何歪曲和篡改，为保衛党的方針政策路綫而斗争，只要这样，我們的各項工作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績。为此：首先必須深入學習全面理解党的方針政策路綫。只有如此才能正确的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路綫。其次，必須不断的向歪曲和篡改党的方針政策路綫的傾向开展不調和的斗争。要知道，在今后整个过渡时期，不管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或处理敌我矛盾，都必然反映出坚决的执行党的方針政策路綫同反对党的方針政策路綫之間的斗争。而任何一个隱藏在党內的階級敌人，都是極力的歪曲和篡改党的方針政策路綫的。因此，能不能战胜各种錯誤傾向保衛和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路綫，在目前时期內，就是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問題。再次，貫徹党的方針政策必須从当前的形势出發，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形势的發展是时紧时松的，

階級鬥爭的形勢是有起伏的。隨着形勢的發展有時要着重強調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有時要着重強調處理敵我矛盾。因此，我們運用黨的方針政策去解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矛盾時，必須從實際出發，具體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否則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錯誤。

第三，黨的團結和統一，是黨的生命，是黨的力量所在。每一個黨員都必須自覺的維護在中央和省委統一領導下的黨的團結和統一，有利于黨的團結和統一的話就說，不利于黨的團結和統一的話就不說，有利于黨的團結和統一的事就做，不利于黨的團結和統一的事就不做。必須加強政治責任心，自覺的同危害黨的團結和統一的不良傾向開展鬥爭；必須加強黨的組織觀念和組織性紀律性，反對缺乏組織觀念、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的分散主義；必須增強黨性，克服宗派主義和本位主義。只要這樣做了，黨的團結和統一就有了保障，黨的戰鬥力就一定會增強，黨就能無堅不摧，無往不勝。

第四，必須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民主集中制是黨的基本組織原則，它一方面能夠保證黨的領導、黨的意志、黨的行動的集中和統一，另一方面又能使黨的的生活生氣勃勃，充分的發揮每一個黨員在統一和集中指導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正是我們黨的強大生命力的源泉。因此，每一個黨員都必須自覺的遵守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向一切違犯和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傾向開展鬥爭。必須加強黨委集體領導制度。堅持重大問題一定要集體討論、集體決定的原則，反對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提倡在黨的會議上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公開自己的觀點，自由爭論，作出決議之後，必須無條件的執行，反對陽奉陰違。堅決執行黨員個人必須服從黨的組織，少數必須服從多數，下級組織必須服從上級組織，全國的各個組織必須統一服從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原則，反對無組織無紀律。堅持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的方針，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活躍黨內民主生活，充分發揮每一個

黨員在統一集中指導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黨對黨員執行黨的決議的監督。

第五，每一個黨員都必須自覺的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經常不斷的克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是萬惡的根源。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時期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是代表反動階級利益的思想傾向，對黨的傷害最大。因為，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是同共產主義思想絕對對立的，它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傷害最大，必須狠狠的予以打擊。必須指出：在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時期，全心全意為黨的事業而鬥爭還是為了個人利益而鬥爭，就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立場的鬥爭，就是共產主義、集體主義思想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鬥爭。誰能在這場鬥爭中，克服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誰就能過好社會主義關，否則，社會主義關是過不去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是只能克服不能掩蓋，誰要怕痛、不肯割掉這條尾巴，任其發展，就必然和孫漢卿、矯楓、崔介等人得到同樣的下場。因此，每一個黨員都必須自覺的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克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黨的利益同個人利益發生衝突時毫不猶豫的犧牲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

最後，代表大會一致認為有必要提醒全黨注意，在我們取得了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的情況下，必須高度的警惕和防止產生驕傲自滿情緒，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為社會主義事業努力學習、積極工作。

代表大會決定：將本決議及市委“關於以孫漢卿、矯楓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問題的報告”向全市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進行傳達，並結合實際情況認真的進行討論，提高全黨的覺悟，克服各種錯誤傾向，以進一步增強青島黨組織在中央和省委統一領導下的團結，提高黨的戰鬥力，以便團結全市人民，推動社會主義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躍進，為完成黨所賦予我們的光榮任務，
艱苦奮鬥。